

中共合肥市党校学报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入库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 王玉堂 历史思维：把握历史主动、创造历史伟业的制胜之道
杜雨薇等 论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
夏明珠等 关于合肥市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王梦琪 加快推进南通现代服务业繁荣发展路径研究

2023年第5期（总第103期）
第22卷 双月刊 9月30日出版

征稿启事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是中共合肥市委主管，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合肥行政学院）、合肥社会主义学院主办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理论刊物。本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关注改革发展前沿问题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紧密围绕省情、市情选稿组稿，大力开展政策研究、市情研究、咨政研究和理论宣传，形成了具有浓厚时代特征、地域特点、党校特色的理论宣传平台。

本刊于2003年入编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并进入CNKI中心网站。现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入库期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为进一步提高本刊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力，将本刊打造成为“合肥市委党校（合肥行政学院）的学术名片和重要窗口”，现向社会公开征稿，热诚欢迎广大社科工作者惠赐佳作。

投稿须知：

1. 稿件应当主题突出、观点鲜明、论证严密、语言文字合乎规范，有独到见解，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或实践借鉴价值。本刊特别欢迎关于“安徽省情、合肥市情”方面的研究报告。

2. 稿件字数以4000-10000字为宜。

3. 将正文以附件形式发过来，并将单位名称、详细地址、邮编、电话、电邮、摘要、关键词（3-5个）、来稿日期、作者简介（出生日期、民族、职称职务、学历学位、研究方向等）放在正文标题下。

4. 参考文献、注释等放在文尾，勿用脚注或夹注。注释是作者对题名、标题或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注释须放在正文后的参考文献之前，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加圆圈标注：①、②、③……。参考文献是作者写作论文时所用引文的出处或参阅的各种书刊资料，须集中列在论文的文末，参考文献序号标注：[1]、[2]、[3]……

5. 来稿文责自负，在不改变文章主要观点的前提下本刊编辑部有权对文章作适当修改，若作者不同意修改请在来稿时作特别说明。

6. 本刊已被“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等收录，如作者无特别声明，即视为同意在网站或光盘上同时刊出。

7. 请勿一稿多投。本刊的选稿周期为3个月，3个月内未收到用稿通知的，作者可自行处理。请作者自留底稿，来稿一律不退。

8. 本刊选稿以质量为唯一标准，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来稿一经刊用即付稿酬并寄送2本样刊。

9. 本刊目前并无网上投稿平台，也未委托任何组织或个人代为征稿。一些打着本刊所谓“官网”名义的网上投稿、征稿平台，骗取作者审稿费、发表费的行为，均与本刊无关，均属非法行为。请投稿作者切勿上当受骗。

本刊样刊浏览网址：<http://hfdx.hfzhi.com/>

本刊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西路901号《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邮政编码：230031

联系电话：0551-62206658 62206629

电子信箱：XB1233@126.com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

2023年第5期

(总第103期)

双月刊

主管单位：中共合肥市委

主办单位：中共合肥市委党校

出版单位：《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编委会主任：陈得良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俊 王辉龙 王良仲 王义 王玉 王智源 江飞

江浩 刘玉勉 孙维红 陈得良 何永义 李安福 李敏琪

李宗开 范观兵 金玥 周良金 胡爱敏 胡厚翠 凌德政

陶晓娟 黄传霞 程千宜 瞿晓陆

主编：马俊

编辑：黄宁平

朱少家

徐书琴

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

历史思维：把握历史主动、创造历史伟业的制胜之道.....王玉堂(3)

论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杜雨薇 吴家华(7)

策论园地

关于合肥市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调查与思考.....夏明珠 叶群慧(12)

加快推进南通现代服务业繁荣发展路径研究.....王梦琪(15)

“八八战略”：系统思维的伟大实践.....周琦(21)

“数实融合”发展的基础及进路研究

——以江苏省泰州市为例.....王婷(26)

版权声明

本刊已许可本刊合作单位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相关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

发 行:《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通信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西路 901 号
邮政编码:230031
电 话:(0551)62206658;62206629
电子信箱:xb1233@126.com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674-5000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4-1249/Z



学思札记

-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实践及现实启示……………祝猛昌 韩璐(32)
- 以大历史观科学把握马克思恩格斯俄国村社思想之“异同”……………王振杰(37)
-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历史性考察
——基于《论犹太人问题》的解读……………王启立(43)
- 《红旗周报》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王淑娜(49)

信息荟萃

- “发现合肥”等六则……………(53)

历史思维:把握历史主动、创造历史伟业的制胜之道

王玉堂

(山东理工大学,山东 淄博 255049)

[摘要]历史思维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在思维领域的具体体现,善于运用历史思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重要的特质。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也是用历史智慧武装起来的政党,是一个高度重视历史思维、也善于运用历史思维的智慧型政党,从成立之初就重视学习和总结历史、重视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注重涵养历史思维、锤炼历史思维能力。历史思维能力是领导力的一个重要维度,提高历史思维能力,必须深入学习和研究历史,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必须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在坚定历史自信、掌握历史主动中谱写历史新篇章;必须发扬斗争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依靠顽强斗争战胜困难挑战、推动事业发展、创造新的辉煌。

[关键词]党的二十大 思维方法 历史思维 历史思维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尊崇历史、研究历史,确立历史思维”^[1]。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我们要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2]历史是过去的现实,承载着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智慧,是继续前进的基础、开辟未来的启示。善于运用历史思维是我们党的好传统,历史思维能力是领导力的一个重要维度,提高历史思维能力是新时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历史、历史思维与历史思维能力

什么是历史?马克思恩格斯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295}历史是前

人的活动记录,真实记录着国家治乱、民族兴衰、政党存亡、政权更迭的过程。但历史呈现给人们的景象往往是杂乱的,在这杂乱的历史背后,隐含的却是智慧和大道,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轨迹和规律,堪称思想的富矿、智慧的宝库^[4],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现在和未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最值得拥有、最值得珍惜的财富,就是他们的历史。所以,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5];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则警告说,“如果丧失对历史的记忆,我们的心灵就会在黑暗中迷失”^[6]。古今中外的事实一再表明,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一个历史虚无主义盛行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一个缺乏历史自信、历史自觉的政党是不可能带领人民把握历史主动、创造历史伟业的。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增广贤文》)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历史思维,简单地说就是思维的

收稿日期:2023-09-20

作者简介:王玉堂,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基地特邀研究员,山东大学领导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合作博士生导师。

历史方法^[7]。历史是一个长时段,历史思维突出历史的生成过程,亦即时间维度上的连续性,以思接千载的穿透力,把过去、现在、未来贯通起来,立足当下观察形势、分析问题、谋划未来。与底线思维作为一种前瞻性、预见性思维方式不同,历史思维是一种典型的后视性、反思性思维,承载着人类探索历史进步的伟大智慧。历史思维能力,就是以史为鉴、知古鉴今,善于运用历史眼光认识发展规律、把握前进方向、指导现实工作的能力^{[8]340},就是把握历史进程、洞察历史规律、运用历史智慧、推动历史进步的能力。

二、中国共产党是善于运用历史思维的伟大政党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也是用历史智慧武装起来的政党,是一个高度重视历史思维、也善于运用历史思维的智慧型政党,从成立之初就重视学习和总结历史、重视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注重涵养历史思维、锤炼历史思维能力。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在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召开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推动实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和统一,成为我们党坚持运用历史思维系统思考和谋划中国革命问题的伟大开端和光辉典范。在此后的若干重要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以史为镜,以史为师,注重从历史中汲取智慧,领导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党就像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的那样,“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9]122},在总结历史经验中统一思想、坚定意志、协调行动、保持强大战斗力;在总结历史经验中发展自己、完善自己、壮大自己,进而成为永远打不倒、压不垮的伟大政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10]399}，“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1]534}。刘少奇同志强调:“以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为指导很好地总结我们党在各方面的斗争经验,……是团结全党、教育全党、提高全党以至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一环。”^{[12]291}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中心工作由农村转向城市、由革命转向建设,面对变化了的新形势,毛泽东同志再次强

调:“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13]383}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指出:“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14]272} 他还说:“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15]292} 随着时代的发展,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指出:“要努力学习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和党的历史,并通过这种学习努力掌握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党的优良传统。”^{[16]121}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同志强调,“历史是继续前进的基础,也是开创未来的启示”^[17]，“只有铭记历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16]152} 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对我们党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深刻历史思维、深邃历史眼光、深厚历史智慧,围绕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提出一系列原创性重大战略思想,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思维导图。201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深刻指出:“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18]61} 2016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强调:“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19]121} 2021年2月,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进一步指出:“要更好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我们必须从历史中获得启迪,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克敌制胜的法宝。”^{[20]513} 这些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更加全面、系统、深刻地学习研究历史、总结借鉴历史经验、不断提高历史思维能力提供了根本遵循。

历史思维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在思维领域的具体体现,善于运用历史思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重要的特质,历史思维能力始终是共产党人辨古识今、执古御今的看家

本领。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21]375}“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就是要求我们在观察、分析和研究问题时，必须坚持历史思维，历史地看问题、看问题的历史，在剥笋见芯、吹沙见金中把问题搞清楚、弄明白、看透彻，进而得出科学的认识，以指导新的实践、创造新的历史。1945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在延安的窑洞里不无悲观地对毛泽东同志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22]61}从成立到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善于运用历史思维的中国共产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20]549}，不仅成功跳出了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避免了“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危险，而且带领人民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伟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管子·形势》）不仅治国理政需要历史思维，日常工作、生活同样也需要历史思维，只不过人们“日用而不知”罢了。历史思维能力是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具备的思维能力。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养成了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的习惯，终身受用。”^{[23]142}

三、不断提高历史思维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人类社会就能更好前进。”^{[20]510}新时代新征程面临新的使命任务、新的发展机遇、新的风险挑战，共产党人只有善用历史思维，不断提高历史思维能力，才能准确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在机遇面前主动出击，不犹豫、不观望；在困难面前迎难而上，不推诿、不逃避；在风险面前积极应对，不畏缩、不躲闪”^[24]，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一）提高历史思维能力，必须深入学习和研究历史

提高历史思维能力，深入学习和研究历史是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才能走得远。”^{[20]511}“欲知大道，必先为

史。”（清·龚自珍：《古史钩沉论》）历史思维源于历史认知，没有深厚的历史素养就不可能有成熟的历史思维。提高历史思维能力，必须加强对历史的学习，在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内在联系中研机析理、寻经觅道；在对历史的深入学习和思考中总结历史经验、凝聚历史共识、汲取历史智慧；在对历史的深入研究和借鉴中洞察历史规律、顺应历史大势、掌握历史主动，从而更好把握现在、开创未来。唯物史观是共产党人认识和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提高历史思维能力，必须牢固树立正确历史观，以“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东晋·王羲之：《兰亭集序》）的历史思维，善于“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20]511}。

（二）提高历史思维能力，必须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

提高历史思维能力，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是根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理论武装是管根本、保方向的基础工作，只有理论上清醒才能保证政治上坚定。理论武装越彻底，理想信念就越坚实，思想就越敏锐，行动就越自觉。”^{[25]283}历史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是中性的，但如果所持立场、观点、方法不同，历史思维的结果就会截然不同。换言之，科学的思想方法、思维方法需要科学理论指导，历史思维同样离不开科学理论指导。如果说历史是历史思维的基础，科学理论指导则是进行正确历史思维、把握历史主动、创造历史伟业的根本。提高历史思维能力，必须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全面把握其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确保历史思维的正确价值取向。

（三）提高历史思维能力，必须发扬历史主动精神

提高历史思维能力，把握历史主动是关键。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最重视的是群众的历史主动性。”^{[26]705}毛泽东同志强调，“我们要提倡主动性”^{[27]255}，“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28]331}。提高历史思维能力，重在把握历史规律、掌握历史主动。主动赢得一切，主动改变一切^{[29]115}。历史主动性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历史主动精神是

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具备的精神品格^[30]。提高历史思维能力,必须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自觉,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准确把握历史进程和历史方位,深刻洞察历史规律和历史大势,主动担当历史责任和历史使命,牢牢抓住变革时机,乘势而上,顺势而为,奋力谱写历史新篇章。

(四)提高历史思维能力,必须发扬斗争精神

提高历史思维能力,增强斗争本领是保障。列宁说:“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21]57}世界是矛盾的,有矛盾就有斗争。斗争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历史都是在不断的斗争中创造的。在历史思维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和判断,最终要通过斗争来证实。提高历史思维能力,必须同步增强斗争本领,发扬“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知难而进、迎难而上”^[2]的斗争精神,坚定斗争意志,把准斗争方向,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依靠顽强斗争战胜困难挑战、推动事业发展、创造新的辉煌,让历史思维在新的伟大事业中更好发挥作用。

四、结语

江泽民同志曾经说过:“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一个民族不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31]301}“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32]61}人类生活的世界,横看是现实,纵看便是历史。人类通过历史实现古今“对话”,历史则在“对话”中闪烁出智慧光芒,进而成为以古鉴今“最好的教科书”^{[1]97}。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规律,说到底就是要善于运用历史思维。只有善于运用历史思维,不断提高通过历史看现实的能力,才能察往知来、顺时应势,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J].求是,2022(14):4-8.

[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王玉堂,李祥彦.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J].理论与当代,2021(3):30-32.

[5](转引)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J].求是,2021(19):4-9.

[6](转引)习近平.铭记历史,开创未来[N].光明日报,2015-05-08.

[7]李正义.历史思维的方法论意义[N].学习时报,2020-06-15.

[8]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

[9](转引)李瑞环.学哲学用哲学:上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0]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3]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6]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17]胡锦涛.坚持改革开放 推进合作共赢——在博鳌亚洲论坛二〇〇八年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N].光明日报,2008-04-13.

[18]习近平书信选集: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19]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下转第31页)

论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

杜雨薇 吴家华

(安徽大学,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更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西方现代化创造了资本主义文明,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但其以资本逻辑为主导造成了资本主义文明的种种弊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一是“人本逻辑”对“资本逻辑”的超越;二是“共同富裕”对“贫富不均”的超越;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失衡”的超越;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超越;五是“和平发展”对“扩张侵略”的超越。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人类文明新形态 超越 资本主义文明

文明是人类创造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反映了人类发展进步的程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特别是形成了突破以往狭隘地域性和保守性特征的现代文明,人类文明自此进入一个新阶段。资本主义现代化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片面追求资本盈利,必然导致资本主义文明的剥削性和侵略扩张性,这种文明发展模式最终会成为文明发展的桎梏。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了深刻批判,展望了未来共产主义新文明的前景。十月革命胜利为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新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保障,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证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苏联模式的失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开辟并不断拓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突破了西方现代化的固有模式,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逻辑,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一、“人本逻辑”对“资本逻辑”的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逻辑,是对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829},资本的原始积累“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1]783}。资本主义萌芽于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随着15世纪末美洲和通往印度航路的新发现,世界市场不断扩大,客观上加速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一方面,英国的资本家和封建贵

基金项目:安徽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名师工作室”项目(立项编号:sztsjh2019-2-6);安徽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领军人才队伍建设”项目(立项编号:sztsjh2019-8-2);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高峰学科研究生创新课题(立项编号:MYGFXK2023YCB01)。

收稿日期:2023-09-19

作者简介:杜雨薇,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2级硕士研究生。吴家华,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族通过各种手段把农民的土地圈起来据为己有,并改作养羊的牧场以在羊毛上获利,这使得农民与生产资料相分离,难以继续生存下去,迫不得已到资本家和封建贵族的牧场出卖劳动力,就此沦为雇佣工人,也就注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被剥削压迫的如血一般的历史。另一方面,英法等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利用武力征服海外殖民地,不仅掠夺大量财富,抢占土地,而且大批贩卖黑人、屠杀当地居民。“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12]296}发轫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英国的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至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制度最终确立。相较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人的依赖关系”^{[3]104},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的特殊性质使得它对于劳动者的剥削带有一定的隐蔽性,人与人之间普遍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异己的物与物的关系。因此,马克思称资本主义社会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3]104}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限制了人的劳动能力,使其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者本人未老先衰甚至过早死亡。人受到资本和货币等异己力量的支配,只能是片面发展甚至畸形发展。这种以资本逻辑为主导发展起来的文明只是属“物”的文明,人也被物化了。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3]104},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才能得到实现。

自从鸦片战争打破清王朝“天朝上国”的美梦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历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而先后失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有了主心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2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结束了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三大改造”之后,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是一条以人为本的发展道路,彻底超越了西方国家以资本为主导的发展逻辑。毛泽东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把群众作为“我们力量的源泉”,将“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

和归宿^[4];江泽民强调“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5]280};胡锦涛号召全党“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6]181};习近平提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等重要论断。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逻辑,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发展的不同需求,以社会的发展进步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方面,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高社会主义驾驭资本的能力,推动资本为人民造福,实现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高品质生活的需求。在政治方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体系,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在文化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同时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文化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社会方面,不断完善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坚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生态方面,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努力为人民创造优美生态环境。坚持胸怀天下,统筹“两个大局”,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满足人民对建设美好世界的诉求。

二、“共同富裕”对“贫富分化”的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对西方现代化造就的贫富分化的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私利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根本动因,无限制地追求私利的最大化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虽然资本主义推翻了封建主义,将生产关系从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变为生产力发展的形式,也使得私利对生产力的激发作用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但工人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资本家付给工人工资,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关系”掩盖了事实上的剥削,资产阶级通过“平等法律”使得资本对于劳动的剥削合法化了。“劳者不获、获者不劳”是资本主义社会剥削和不公平现象的真实写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劳动过程要受资本家支配,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劳动产品也归资本家所有,劳动者本人只能获得很少一部分社会财富,工人的辛勤劳动主要是在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而资本家不劳动却可以无偿占有工人创

造的剩余价值。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显著特征,必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引起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持社会秩序,资产阶级制定并不断完善社会福利制度,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决定了福利制度只能暂时维持社会稳定,一旦发生经济危机,资本周转困难,资本家首先会把手伸向福利基金,底层人民会再次回归赤贫状态。贫富分化是资本主义的痼疾,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资产阶级不愿也不能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共同富裕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只是遥不可及的幻影。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取向,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的价值追求。毛泽东指出,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7]495}。在邓小平看来,共同富裕是我国在改革中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具有无可比拟优越性的体现。在论述社会主义的目的和本质时,邓小平也一再强调共同富裕的重要性。在新时代,习近平把共同富裕看作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强调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要求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为此,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共同富裕提供制度保障。在发展战略上,我国相继推出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乡村振兴等重大举措,不断改善区域间增速极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政策上,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的救济减贫,到改革开放后一系列大规模扶贫,再到新时代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的精准扶贫,都始终围绕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目标。在实现方式上,激发人民群众创造力和积极性,挖掘并释放国内生产潜力,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的方式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根据“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十四五”时期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将迈出坚实步伐,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会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历史和现实证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超越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分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失衡”的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是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失衡的超越。以资本逻辑为主导,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一方面激发了人们生产创造、科技创新的积极性,提高了生产效率,推动物质文明不断发展,但另一方面也造成社会生产无限扩大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引发马克思称为“生产过剩的瘟疫”的经济危机,形成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发展的桎梏。更重要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科学技术、自然资源、地理环境和精神文化等都只是为生产剩余价值而被最大限度利用的手段和条件,形成资本主义社会主导性意识形态——物化意识,以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为主要形式的拜物教盛行。个人主义成为资本主义道德原则,把个人凌驾于集体和社会之上、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成为公开而普遍的价值追求,人们信仰缺失、精神空虚,人成为片面发展的“物化的人”“单面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表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失衡”是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重要特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把“新文化”“新经济”“新政治”作为未来新社会、新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提出“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8]63}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精神文明建设放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位置,不断将精神文明建设推向更高水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贯彻“两个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强大精神养分,浇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树。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汇聚精神力量。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中国梦、伟大建党精神等,不断强化思想武装,夯实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共同的思想基础和信仰信念。开展“清朗”系列专项行动,解决网络环境中一系列乱象,为人们营造天朗气清的网络环境。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使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得到满足。创设文明实践基地,评选道德模范和全国好人,推动精神文明深入基层、深入人心。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的现代化,彻底摆脱了西方资本逻辑和物化意识带来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失衡的后果。

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对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要想长久生存,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最终得到自身解放,就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西方现代化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概括就是“人征服自然”,弗朗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亦即知识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然界的一切领域都服从于生产。因此,劳动者成了资本逐利的工具。资本主义现代化以资本不断增殖为根本逻辑,虽然促进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但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被打破,造成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局面。西方现代化“征服自然”观念的形成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以及以资本为主导的发展逻辑分不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反生态性。其一,以工业革命为标志,人类社会工业文明进入现代化阶段,生产力迅速发展,而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通过生产扩张和消费扩张将自然资源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中,受资本的调动和支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本逻辑对自然界的支配地位日益强化,人与自然之间的直接联系被切断,自然界成为资本奴役的对象,造成人类与自然的对立和冲突。其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具有私人占有性质,股份制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是改变了资本的私人占有形式,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也没有改变资本追求自身增殖最大化的本性;而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本身具有社会属性,为全社会共同享有。资本的私有性质和生态环境的共有性质必然导致二者之间无法解决的矛盾和冲突。其三,资本逻辑和生态文明对立的现实表现形式是资本无限扩张

和自然资源的有限之间的矛盾。资本贪婪扩张和对自然无下限的压榨,所带来的就是资源匮乏、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粮食缺乏、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全球性问题。同时,由于环境的承载与净化能力的有限性,自然危机最终演化为人类文明的危机,终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走向自我毁灭。

中国式现代化破除了人与自然的对立,把人与自然看作一个和谐共生的有机生命体,强调要走一条绿色、低碳、环保、可持续的发展之路。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前瞻性地认识到人类“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强调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9]98}。树立人与自然一体化的观念是解决人与自然对立问题的前提,这为中国式现代化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也进一步加深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毛泽东发出“绿化祖国”的号召;邓小平要求以科学技术推动生态环境建设,以法律制度保障生态环境建设;江泽民和胡锦涛相继提出“可持续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等重要论断;习近平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10]355},按照自然规律开发利用自然。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后发式现代化,这就为吸取西方方式现代化的经验教训提供了现实条件。我国现代化启动的时候,地球的生态红利已经被资本主义现代化基本耗尽,受到严重的碳约束和气候约束,全球性生态问题日益突出,克服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不良影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将美丽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二十大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方面的特色之一,并强调要从思想、法律、体制等多方面合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11],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高度自觉。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在认识和实践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超越。

五、“和平发展”对“扩张侵略”的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对通过扩张侵略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具有对外侵略扩张的本性。资本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为最大限度地逐利,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增强市场竞争力,资产阶级利用军事力量建立海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作为商品的倾销地、廉价原料供给地和资本输出地。资本扩张的本性决定了西方现代化必然伴随着侵略、奴役与压迫。从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开始,“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对他国的殖民掠夺以及对本国人民的压榨就注定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走的是一条充满血腥与暴力之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无不是通过战争和掠夺发展起来的。凭借着先进的军事设备,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都以武力征服的方式,在亚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建立起自己的殖民地。英国通过殖民扩张,建立了“日不落帝国”的殖民统治体系,在这一庞大体系中,加拿大、澳大利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分别成为英国的主要粮食供应地、畜牧场和矿产地。中国由于反抗英国的鸦片输送、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而割地赔款。美国的现代化也是这样,贩卖黑人,屠杀印第安人、掠夺其土地,实施种族灭绝。德国和日本为实现强国目标,不惜发动世界大战,给全人类带来了深重灾难。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帝国主义殖民体系逐步瓦解,一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先后走上了独立的道路,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资本主义过去那种赤裸裸的掠夺与压榨在当前形势下已经行不通了,他们对于世界的掠夺由旧殖民主义转变为新殖民主义。当代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打着“援助”的幌子,以军事力量为后盾,采取比较温和、隐蔽的手法,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剥削、政治控制和文化渗透,维护和发展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张本性未改。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扩张的老路,选择了一条和平发展之路。其一,和平发展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天下太平”等理念,孕育了热爱和平的民族秉性,培育了和平发展的民族基因。我国古代的“丝绸之路”既是一条贸易之路、文化之路,也是一条和平之路,张骞出使西域、鉴真东渡、郑和下西

洋都体现了我国崇尚和平交往、文明交流的特质。正如习近平所说,“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10]其二,和平发展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启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和奴役,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遇前所未有的劫难。近代中国不断“挨打”的苦难经历,让中国人民更感和平的宝贵,也坚定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就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为我国迈上和平发展之路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辟了一条以和平为导向、以发展为目的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深化不同民族文明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世界文明发展。其三,和平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经验。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始终坚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顺应形势,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壮丽征程。我们党带领人民不断拓展现代化道路,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提出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根本上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扩张侵略”的发展逻辑。事实证明,“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12]267}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4]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8-21.

(下转第25页)

关于合肥市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夏明珠 叶群慧

(合肥市委党校,安徽 合肥 230031)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近年来,合肥市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切入点,推动系统集成改革,夯实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基础。本文结合合肥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现状、相关政策及其执行过程,提出优化合肥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高标准农田 管护 合肥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农业是社会秩序的稳定器、经济发展的压舱石,而农田建设又是农业发展的基础性工程。合肥市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切入点,系统推进“两强一增”、土地流转和农业社会化服务,推动项目、资金、政策、力量系统集成,夯实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基础。截至2023年5月,全市高标准农田建成面积401万亩,占耕地面积比重达55%,占永久基本农田比重达64.7%。建成高标准农田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技术覆盖率达95.13%,2022年全市粮食总产294.2万吨,居全国省会城市第5位。

一、合肥市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主要做法

(一)突出量质并重

针对合肥区域地形多样、江淮分水岭区域土地资源禀赋总体不高的现状,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重点,加快补齐农田短板。科学规划。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和村庄规划编制,科学编制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优先选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粮食生

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建设高标准农田,按照平原圩区、低山丘陵区、丘岗区等不同类型实行分区域、分类型差异化整治,宜水则水、宜旱则旱。注重质量。出台合肥市高标准农田建设技术导则,明确平原圩区、丘岗区、低山丘陵区不同区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实行黑(必选项)、红(禁止项)、绿(推荐项)三色管理。出台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工作规范,强化项目勘察、测绘、设计、施工、材料采购、监理、评估评审全过程质量管控。强化管护。压实县、乡、村各级责任,建立健全“谁受益、谁管护,谁使用、谁管护”农田管护机制,创新管护方式,落实管护主体,力争建成的每一块高标准农田都不失管。

(二)突出用养结合

制定《合肥市农田耕地质量建设实施方案》,采取“改、培、保、控、推”等单一或综合措施,稳步提高耕地质量。改良土壤。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针对少数地方酸化、盐碱土壤,有针对性实施土壤

基金项目: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合肥行政学院)2023年度重点课题“合肥推进‘小田变大田’集成改革实践探索”

(立项编号:HFDXKT202312)。

收稿日期:2023-09-18

作者简介:夏明珠,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合肥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教授。叶群慧,合肥市农业农村局农田办主任。

改良,确保改良后的土壤 pH 值达到 5.5~7.5。培肥地力。普及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积极推广商品有机肥、绿肥种植、秸秆还田等有机肥替代技术,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保水保肥。积极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打破犁底层,加深耕作层。控污修复。大力普及化肥、农药减量使用技术和残留农膜回收利用处置,减少不合理投入量。在巢湖、肥东、庐江、长丰等区域,营造农田生态拦截工程,推广农田尾水“零直排”技术,建设绿色生态农田。推广绿肥和秸秆还田。重点推广单季稻茬绿肥、稻麦秸秆全量还田等种植技术模式,覆盖率达 95.1%。

(三)突出资金投入

增加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积极争取中央、省各类资金,加大市级财政投入,在中央财政 1000 元/亩、省级财政 750 元/亩投入基础上,合肥市按照平原圩区 320 元/亩、低山丘陵区 400 元/亩、丘岗区 530 元/亩标准,对县(市)予以差异化奖补。以县(市)为单位,扣除中央、省级补贴资金后,市、县按照 1:1 承担,2023 年高标准农田亩均投资达 2750 元以上,最高达 4000 元左右。加大耕地保护利用和监测评价投入。实施水稻绿色种植奖补资金,支持绿肥+优质稻模式推广、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和水稻种植有机肥替代,每亩分别补贴 200 元、100 元、200 元;安排测土配方补助,对每季作物按照 14 元/亩标准补贴,其中巢湖流域一级保护区按照 20 元/亩标准补贴;开展小麦统防统治;开展 1 万个左右测土配方施肥采集点位检测;开展耕地质量监测评价工作。

二、合肥市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建设标准低

合肥市 2019 年以前实施的高标准农田项目亩均投资不到 1000 元,现行标准亩均 2750 元,相当于南京市的一半,杭州市的 70%。工程设计和建设质量不高,已建高标准农田存在基础设施配套不全、地力提升工程质量不高等问题。全市耕地等级 4.75(杭州市 3.97、南京市 3.64),其中:优等地面积比重为 28.5%,比全省平均水平低 14 个百分点;中等地、差等地面积比重分别达 53.4%、18.1%,差等地面积比重比全省平均高 10 个百分点。部分田园环境脏乱差,有田园无颜值。

(二)建后管护不足

一些地方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建成后,高效节水等喷灌设施闲置、机电井成“摆设”,断头路、断头渠、阴阳田,蜂窝麻面、机井淤积、桥梁裂纹、沟渠堵塞,已建设施不能用、不好用、毁损严重等现象都不同程度存在。高标准农田重建轻管^[1],农田水利工程管护不到位、年久失修、过度损坏现象频现,不利于工程长效运行和发挥预期效益。

(三)政策效应低

高标准农田建设单兵突进,与合肥市“两强一增”“大托管”等涉农政策系统集成不够,好政策向好产量、好效益集成转化不明显。粮食亩均产量较南京市低 100 公斤,劳动生产率分别相当于南京市的 55%、杭州市的 46%,土地产出率分别相当于南京市的 53%、杭州市的 42%。

(四)工作机制不完善

推进机制单一,部分地方仅靠农业农村部门单打独斗,涉及规划、投融资及杆线整治等方面的问题解决得不够好。投入渠道单一,部分地方仅靠财政专项投入,没有抢抓当前扩大内需战略机遇,用足用好政策专项债和引导金融投资高标准农田建设。绩效评价机制不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在政府粮食安全目标考核中权重低(仅占 6%),考核指挥棒作用不明显,不能充分调动县、乡两级积极性。

三、合肥市优化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对策

以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系统化集成改革为抓手,统筹项目、政策、要素合力,整市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补齐农业基础设施短板,全面提升耕地质量水平,全面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一)加强高标准农田质量管理

一是严把标准关。贯彻《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GB/T30600—2022),出台合肥市高标准农田建设技术导则,紧扣“田、土、水、路、电、管、生态”等七个方面严标准、强质量、增效益。二是严把质量关。出台合肥市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管理工作规范,强化项目测绘、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材料采购、评估评审、竣工验收的全过程质量管控,力争每一块农田都成为高质量工程。三是严把管护关。明晰管护责任,畅通农田设施损坏信息反映渠道、建立应急维修机制、严厉打击人为损坏情况^[2]。

(二)系统集成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切入点,系统推进农业标准地改革、农业“双强”、农田环境整治和数字农业建设,打出项目、政策、要素、力量组合拳。一是推进集中连片建设。以乡镇、行政村或以灌区为单元,统筹高标准农田新建和改造提升,统筹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和农田地力提升,统筹永久基本农田整治和其他农用地整理,统筹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田水利最后一米、农事服务中心(育种中心、烘干中心)建设,统一项目谋划、融资、规划建设。鼓励各地以乡镇或以跨乡镇为单元,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于零散地块,通过“小并大、短变长、弯变直、陡变缓”等措施,最大限度整合归并田块,实现规模集中连片。二是推进科技强农、机械强农。组织农业行业首席专家工作室团队和科技特派员团队“双领衔”开展对建后高标准农田的包保服务,打通农业“四新”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推行“按图索粮”、订单合作,发展专用品牌粮食生产。推行农机农艺融合和全程机械化生产示范,按需配备粮食烘干中心、育秧中心、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实现主要生产环节机械化全覆盖。三是推进农田环境整治。对已建成高标准农田普及农作物测土配方施肥、绿色病虫害防控、农膜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在巢湖流域水环境一级保护区、饮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推进稻田退水“零直排”工程,建设生态高标准农田。围绕“点上干净、线上美丽、面上洁净”目标,全域开展田间环境整治。四是推广智慧管理。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种植业、农机作业等深度融合,推动环境调控、水肥一体化喷滴灌、农业航空装备等技术产品在高标准农田中应用,探索建设无人农场。利用中国智慧农业谷平台,推动农业机器人在高标准农田试验研发运用。统一布局数字化苗情监测点、墒情监测点、病情监测点。

(三)统筹抓好耕地改善提升

一是构建新格局、制定新规范。衔接全市国土空间规划,构建“一带一圈六片”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新格局。“一带”发展江淮分水岭岭上田园示范带;“一圈”发展环巢湖沿岸生态农田示范圈;“六片”发展岭北、岭西、岭东宜机高效示范片,丰乐

河-杭埠河-白石天河、浮槎山-柘皋河沿岸绿色田园示范片,兆河-西河沿岸低碳田园示范片。结合合肥市地形地貌,分区域分类型制定地方技术规范导则,打造具有合肥特色的“小田变大田”。二是抓好耕地质量保护工作。强化高标准农田利用管理,及时把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划为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农田建设确保耕地总量“进出平衡”,配合资源规划等部门抓好全市耕地质量管理工作。三是加强耕地质量监测评价网络建设。抓好耕地质量长期监测点建设,形成覆盖全市主要耕作制度、主要农作物、主要土壤类型的耕地质量监测网络,定期发布耕地质量监测评价报告、土壤墒情监测报告,稳步做好测土配方采样点布设和采样工作。

(四)完善农田建设组织协调机制

一是建立专班运作机制。成立市、县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专班,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专班推进、部门协同及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二是健全多元投入保障机制。抢抓扩大内需战略机遇,以县(市)为单位,统一谋划高标准农田重大项目,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及中央、省财政专项投入,对接政府专项债及相关金融支持政策,综合保障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三是健全绩效评价机制。将高标准农田建设从粮食安全政府考核指标中单列,提高相应分值,有关结果直接运用到相关考核中。将绩效评价延伸到乡镇。四是建立清单化闭环式调度机制。紧盯项目谋划、工程建设、资金投入、集成改革、田园环境等重点环节,采取一线督导、定期销号等方式,对有关重点事项实行双周调度、双周通报。

参考文献:

- [1]王菁等.关于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工作的思考——基于山西省运城市的实践[J].中国农业综合开发,2021(4):52-53.
- [2]霍秀娜,张燊,郝桂喜.山东济南 浅析高标准农田设施管护困境及对策[J].中国农业综合开发,2023(6):39-40.

责任编辑:徐书琴

加快推进南通现代服务业繁荣发展路径研究

王梦琪

(南通市通州区委党校,江苏 南通 226300)

[摘要]近年来,南通致力于现代服务业的繁荣发展,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效,但也面临着一些短板和不足。下一阶段,加快推进南通现代服务业大繁荣大发展,需要促进规模壮大,深化项目建设“强支撑”;聚焦创新提质,围绕升级需要“强供给”;推进融合增效,加快产业协同“强动能”;突出载体提档,助力企业壮大“强品牌”;加速人口集聚,引培优质人才“强磁场”;加大支持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强生态”。

[关键词]南通 现代服务业 繁荣发展 路径

服务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现代服务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1]。2022年年初,南通先后发布《南通市“十四五”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和《南通市现代服务业繁荣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年)》两份文件。2023年2月,南通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推动经济运行率先整体好转促进制造业倍增和服务业繁荣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其中提到“支持服务业重点行业提质增效”。那么,在大力支持和加快推进现代服务业繁荣发展的背景下,南通如何把握契机,突破瓶颈,让现代服务业成为推动南通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是目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现代服务业的基本内涵

2023年7月,国家统计局下发的《现代服务

业统计分类》将现代服务业的概念界定为:现代服务业是指伴随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加强公益性基础性服务业发展所形成的具有高技术含量、高人力资本含量、高附加价值等特征的经济活动。该分类将现代服务业范围确定为:0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02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03 金融业,04 现代物流服务业,05 现代商贸服务业,06 现代生活服务业,07 现代公共服务业,08 融合发展服务业等8个大类。由于国家统计局《现代服务业统计分类》中有些行业类别中仅部分活动属于现代服务业,该部分数据难以分开测算。考虑到纵向和横向数据取得的便利性与可比性,本文语境中的现代服务业是指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基金项目:南通市党校系统2023年度调研课题“加快推进南通现代服务业繁荣发展路径研究”

(立项编号:2023NTDY33)。

收稿日期:2023-09-22

作者简介:王梦琪,中共南通市通州区委党校培训科副科长、讲师。

表 1 2020–2022 年南通现代服务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及 GDP 占比情况

年份	现代服务业增加值 (亿元)	第三产业增加值 (亿元)	GDP (亿元)	现代服务业增加值 占第三产业增加值 的比重 (%)	现代服务业增加值 占 GDP 的比重 (%)
2020	2492.17	4811.76	10018.31	51.79	24.88
2021	2694.01	5163.61	10946.95	52.17	24.61
2022	2921.23	5258.50	11379.60	55.55	25.67

数据来源:南通市统计局

表 2 南通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分行业增长速度情况

单位:%

分行业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19–2022 年 平均增速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6.2	22.8	12.5	13.63
金融业	6.5	4.6	7.2	6.09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9	8.1	2.6	4.16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7.2	10.6	8.7	8.82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7	-0.8	1.6	1.48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3.8	13.8	5.9	11.10
教育	5.1	8.0	4.6	5.89
卫生和社会工作	5.5	9.6	7.3	7.45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9	11.7	2.2	5.17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4.0	8.1	9.5	7.17

数据来源:南通市统计局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二、南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成效

近年来,南通积极应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有效引导和精准施策,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取得一定的发展成效,为南通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产业规模日益扩大,综合贡献进一步增加

目前,现代服务业作为现代化产业中的代表性产业其总量规模不断扩大,对服务业的支撑作用越来越强。南通现代服务业增加值从 2020 年的 2492.17 亿元提高到 2022 年的 2921.23 亿元(见表 1)。南通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从 2020 年 21.74% 提高至 2022 年的 52.52%,2022 年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在第三产业增加值中的占比为 55.55%,现代服务业逐渐成为拉

动第三产业的重要动力。

(二)内部结构持续优化,各项指标进一步提升

从 2019–2022 年平均增速来看,南通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年均增长率最快,为 13.63%,接下来是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卫生和社会工作,分别为 11.10%、8.82%、7.45%(见表 2),现代服务业的内部结构持续优化。南通的科技服务业发展势头尤为强劲。2022 年,南通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营收增幅为 32%、全省第二,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从业员工工资总额增幅为 8%、全省第一。2022 年,南通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 16.8%,其中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 19.4%。

(三)新业态新模式涌现,发展动力进一步增强

近年来,全产业链工业设计、供应链管理等服

表3 2022年南通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分行业占比情况

单位:%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	卫生和社会工作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7.82	27.28	8.34	9.39	1.10	7.36	9.47	7.86	2.78	18.59

数据来源:南通市统计局

务业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涌现,以电子商务、物联网建设、信息化平台等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成为现代服务业发展新的增长点,尤其是“互联网+”激发服务业新动能,服务业数字化步伐加快。2022年,南通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56.9亿元,比上年增长0.5%。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1238.5亿元,比上年增长1.7%,其中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比上年增长31.7%,住宿和餐饮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餐费收入增长9.5%,增速大幅度上涨。

(四)载体引领不断加强,集聚效应进一步显现

集聚区是区域服务业转型升级的主阵地,也是推动现代服务业繁荣发展的重要载体。2023年1月,江苏省发改委公布第二批省级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集聚示范区名单,南通高新区科技服务集聚区、南通五龙汇商圈服务业集聚区、南通中央商务区集聚区、叠石桥电商产业园、张謇故里景区等5家集聚区入选,去年是3家入选,南通的入选数连续两年位列江苏省第一。2023年3月,江苏省发改委发布江苏省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331”工程综合评价确认名单,南通市16家服务业集聚区全部通过认定,获评率100%。此外,2022年南通现代服务业集聚区营收总额超4779亿元、税收117亿元,其中年营收百亿元以上集聚区9家,千亿元集聚区1家,集聚效应不断释放。

三、南通现代服务业的短板和不足

2020年,南通的第三产业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但在疫情、外部环境变化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下,这两年未能延续“三二一”的产业结构。2021年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调整为4.4:48.6:47.0,2022年再次调整为4.5:49.3:46.2,可见南通的服务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现代服务业的短板和不足较明显。

(一)产业层次不够高,特色竞争优势不足

南通现代服务业的突出问题是中低端的多、高端的少,传统模式的多、新型业态的少。从表3可以看出,2022年南通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占现代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为9.39%,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占比仅为7.82%。信息消费、线上医疗等民生服务新模式发展不够,共享经济、体验经济等新兴领域发展成效不明显,与上海、苏南等先进地区差距较大。此外,南通各地现代服务业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地区分布不均衡,崇川区多项现代服务业发展指标位居南通前列,可以说是一家独大,其他各县市区相对薄弱。南通各地现代服务业主导产业还不够聚焦,招商政策不够精准,同质化竞争较为明显,区域产业特色不突出。

(二)融合赋能不够强,优质服务供给不足

南通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供给不充分,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与高端纺织、船舶海工等优势产业相配套的研发设计、信息服务、供应链管理 etc 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仍然较为滞后,两者的融合成效还不突出。数字化、信息化赋能也不足,面向先进制造业的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人力资源服务等水平不高,提供技术支撑、运营管理、商务服务、产业融资的融合发展平台较为稀缺。在江苏省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331”工程综合评价确认名单中,省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两业融合标杆引领典型中试点单位一共37家,南通只有5家;试点区域一共10个,涉及南通的数量为0个。与此同时,南通的生活性服务业仍存在体验性不强、便利性不够、质量标准不高等问题,多样化、精细化、品质化和个性化的服务供给不足,消费体验有待提升。

(三)龙头企业不够多,引领示范带动作用不足

南通现代服务业领域的大部分企业品牌意识

淡薄,培育品牌的能力不足,品牌建设明显滞后,具有较强行业影响力的自主品牌相对较少,能充当行业标杆、带动行业发展的领军企业不够多。在江苏省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331”工程综合评价确认名单中,南通入围的省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领军企业只有6家,占比仅为4.2%。截至2023年8月,南通拥有规模以上服务企业2270家,数量仅次于南京和苏州,列江苏省第三。但是2023年1-8月,南通户均营业收入仅为3353万元,列江苏省末位,为南京的31.3%、苏州的39.3%,可以看出南通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的单体规模偏小,拥有核心技术和较强市场竞争力的龙头企业较为稀缺。

(四)人口集聚不够快,专业复合人才不足

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现代服务业是以“人”为本的行业,繁荣发展的关键在于人才。2021年,南通首次实现人口净流入。2022年年末南通常常住人口为774.35万人,同比增长0.14%,高于2020-2022年平均增速(0.08%),但略低于“十三五”平均增速(0.15%)。可以看出,南通实施“人口集聚工程”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人口集聚速度还不够快。2022年,南通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为205.13万人,比上年减少5.03万人,在三次产业从业人员中是数量减少最多的。此外,南通从事现代服务业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高素质的管理人员较少,在信息技术、服务外包、交通运输、文化创意、商务服务、金融等现代服务业方面的专业人才严重匮乏。在产业融合发展和智能化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大量的现代服务业企业需要复合型跨界人才,南通在这方面人才的供给上也明显不足。

四、加快推进南通现代服务业繁荣发展的路径选择

现代服务业的体量大小、活力程度,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新时代新征程,南通必须聚焦产业转型升级、满足居民消费升级需要,着力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品质,加快推进现代服务业繁荣发展,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服务业新体系。

(一)促进规模壮大,深化项目建设“强支撑”

《南通市现代服务业繁荣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年)》提出的总体目标强调三个“显著提升”,首要的就是规模效益显著提升。要实现规

模以上服务业重点行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15%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5000亿元的目标,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其一,加大招引力度。通过亲情招商、会展招商、组团招商引进境内外现代服务业领军企业及境内现代服务业企业总部,大力招引产业关联度高、互补性强、成长性好、附加值大的项目,在现代服务业发展重点领域精心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比如,顺应“新消费”发展趋势,聚焦高端商贸、数字文化、全域旅游、康养服务等领域,招引一批高品位、大体量、具有地标意义和震撼效应、能够吸引眼球的重点项目,打造南通服务业发展新地标。其二,优化推进机制。南通市2023年市级重大产业项目清单中新开工服务业项目有32个,要按照签约项目抓开工、开工项目抓竣工、竣工项目抓达产的要求,进一步缩短项目建设周期。查找制约项目建设的关键因素,细化工作举措,落实专班专人负责,健全服务业项目考核机制。其三,提高服务质量。推动用地用能安排向优质服务业项目倾斜,开展项目融资银企对接服务,积极引导优质项目建设单位争取国家、省、市各级服务业政策支持。完善重点项目服务机制,实施省、市级服务业重点项目全程跟踪和组团式服务,为项目建设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总之,要持之以恒抓招商、攻项目、优服务,进一步提升重大项目示范带动作用,以项目建设之“进”促产业规模之“大”,使之成为南通现代服务业繁荣发展的强大支撑。

(二)聚焦创新提质,围绕升级需要“强供给”

繁荣发展现代服务业,必须遵循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律、顺应其发展趋势,着力提升服务业品质化水平。其一,加快创新发展,聚焦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产业创新力,加快发展研发设计、工业设计、商务咨询、检验检测认证等服务。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推动供应链金融、信息数据、人力资源等服务创新发展。增强全产业链优势,提高现代物流、采购分销、生产控制、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发展水平。还要“根据现代服务业特点,不断创新服务业模式,从原来的产品、技术创新向组织、市场、概念等创新转变,将创新作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内驱动力”^[2],依托创新助力现代服务业不断升级。此外,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加持下,现代服务业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数字化转型。要积极发展在线研发、数字金融、智慧物流、在线检测等生产性服务业领

域在线新经济,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提升服务业发展效率与质量,从而提高服务附加值和经营效益。其二,提高服务品质,满足居民消费升级需要。形成多层次便民服务生活圈,构建多层次新型消费商圈,推出适应居民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消费需求的高端服务产品,推动体验式消费、个性需求定制服务市场繁荣发展,使服务业供给水平和质量能够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进一步提升商贸、文旅等生活性服务业质量与档次,积极发展“云逛街”“云购物”“云旅游”等在线经济,提升居民消费便捷度和满意度,放大南通的张謇文化、野生动物园等特色文旅资源优势,举办“江海风情·夜南通”文旅消费季、“追江赶海游南通”专场直播等文旅消费促进活动,不断打造一批江海特色消费品牌,真正留住本地消费、吸引更多外来消费。

(三)推进融合增效,加快产业协同“强动能”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发挥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剂作用,坚持以融合化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其一,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耦合共生。制造衍生服务,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推动高端装备、电子信息等先进制造业集群内的重点企业全面开拓高端科技、个性化定制、工业设计、工业互联网、大数据、融资租赁、整体解决方案、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等服务领域,引导制造企业将价值链由以产品制造为中心向以提供产品、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并重转变,提供更多“智能产品+增值服务”。服务带动制造,深化服务业制造化程度,鼓励大型服务企业(平台)利用信息技术、营销渠道、创意设计等优势,加强科技创新和关键技术攻关,向制造环节延伸拓展业务范围,通过工业互联网、工业设计、供应链管理等服务全面嵌入先进制造领域,实现服务产品化发展。其二,推动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融合发展。大力提升信息、科技、金融、物流、商贸服务等为农业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服务的能力,搭建农技推广服务、农产品展示营销、品牌策划等综合服务平台,培育发展农村电子商务,深度开发农村生态旅游,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利用并发展智慧农业,发展休闲度假、休闲渔业等新业态,培育长寿旅游、研学旅游、体育旅游等新产业,推动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康

养等产业深度融合。其三,推动服务业内部融合发展。支持科技、信息、文化、旅游、出行、养老、健康、设计、法律等服务业相互融合,培育特色文旅、智慧健康养老、数字创意、法律科技等融合发展新业态,推动实现服务业全产业链融合,积极拓展服务增值空间。总之,要顺应产业发展大势,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推动产业链纵向协同、创新链精准赋能、价值链高端攀升,增强产业发展的接续性和竞争力,通过融合增效加快产业协同发展,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强劲动能。

(四)突出载体提档,助力企业壮大“强品牌”

载体平台是增强现代服务业质效的重要中介,企业主体则是加快推进现代服务业繁荣发展的最关键要素。其一,优化服务,提升集聚载体能级。积极引导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围绕产业链培育创新链,立足创新链打造价值链,加快集聚区内研发设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专业技术服务、展示交易、中介服务等公共平台建设,强化集聚区功能配套,提升园区服务效率,增强集聚区要素吸附能力、产业支撑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推动集聚区做大总量、做多企业、做强特色、做好平台、多做贡献。其二,提升质效,致力于企业上规模。以“做多增量、提升质量”为总目标,以“培育增量企业、提升存量企业、转化小微企业”为培育路径,从上至下高度重视规模以上服务企业培育工作。实施“小升规”跟踪培育、“个转企”申报代办、“产转法”(产业活动单位转为独立注册的法人单位)协同推进、主辅分离推进、税收协同共治五项推进机制。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本行业规模以上服务企业的培育指导,帮助协调解决相关难题,加快培育一批业态先进、附加值高、带动突出、竞争力强的规模以上服务企业,改变南通规模以上服务企业的单体规模江苏省最低的格局。其三,打造品牌,培育更多领军企业。引导现代服务业企业树立品牌意识、健全品牌运营管理体系,打造国内外高端服务品牌。科学制定品牌战略发展规划,分类指导,梯次推进,根据品牌产品的评价体系、具体要求,对辖区内规模企业、主导产品进行全面分析,研究制定品牌培育发展的具体方案,分类别、分层次建立品牌培育库,实施有典型、有重点的培育发展计划,同时要抓好品牌保护,认真做好品牌培育、辅导、认定、申报和维护工作。制定细分行业领

军企业培育办法,从成长型和贡献型两个角度构建梯次培育机制,逐步培育一批有技术、上规模、具有较强核心竞争力的现代服务业领军企业。支持中小微企业利用关键技术、数据资源、营销网络等独特优势在细分领域成长为“单打冠军”“独角兽”和“瞪羚”企业,培育处于价值链顶端、具有全产业链号召力和影响力的龙头企业。

(五)加速人口集聚,引培优质人才“强磁场”

人口规模是城市规模和城市能级的重要标志,人才是第一资源,加大人才资源的引进与培育力度可以有效提升南通现代服务业的竞争力水平。其一,吸引高校毕业生回南通留南通就业,加速人口集聚。要大力落实《南通市人口集聚工程实施方案(2022-2025年)》要求,打造“令人向往的青年和人才友好型就业城市”。在持续实施南通籍人才“归雁行动”、不断提高南通籍学生回南通就业的比重,同时,加大南通院校毕业生留在南通就业的激励力度,鼓励南通市内外高校学生在南通见习(实习),创造更多认识南通、了解南通的机会,从而留在南通。除此,建设“人才社区”和“青年人才驿站”,大力实施住房安居优居、“筑巢引凤”工程,加快放大南通基础教育品牌优势,确保来南通就业参保的职工子女都享有义务教育的“同城待遇”,从而提升人口集聚吸引力。其二,加强优质专业复合型人才引进与培育。具体而言:一是完善相关政策,改善软环境,畅通人才引进绿色通道,大力引进高层次、高技能现代服务业人才,吸引数字服务、数字贸易、科技咨询和评估、技术经纪(经理)、法律服务等领域高端服务业人才来南通创业就业。二是支持南通大学及各大高职院校加快现代服务业相关学科的建设,健全以企业为主体的定制式、订单班、现代学徒制等多层次人才培养模式,大力培育金融、科技研发、软件等生产服务业领域高级管理人才以及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建立产学研用结合的现代服务业实训基地,开展多岗位交叉培训、适岗培训等,培育复合型跨界人才。三是满足职业发展需求,依托张謇企业家学院等企业家培训平台举办重点服务企业专题研修班,探索建立现代服务业人才分类评价体系,对各领域人才实行分层、分类多形式多渠道的补贴奖励,加大对高技能人才的表彰奖励力度,畅通职称晋升渠道。

(六)加大支持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强生态”

现代服务业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服务、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其一,加强财政支持力度。贯彻落实国家和江苏省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各项财政政策,创新财政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方式,加快推进产业基金资本化运作模式,支持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进一步放大南通市级服务业引导资金对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对关键产业补链、创新平台载体、高技术服务及新模式、新业态项目予以重点支持,激励增量投入,鼓励提质增效。其二,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撬动更多金融资本、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流向现代服务业领域。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降低服务门槛、弥补市场不足。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针对现代服务业企业特点,开发仓单质押、专利质押等金融产品,重点支持小微企业创新发展,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其三,改进市场环境。要消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放宽准入限制,畅通退出机制,营造公平竞争氛围。在资源配置中,强化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提高市场开放度,促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具有竞争力的企业集聚,鼓励企业以技术、资本等要素为纽带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更大力度发挥现代服务业的创造性和活力,提升其运行效率。其四,优化政务环境。深入推进政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持续推行审批服务“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不断释放制度红利。推动现代服务业相关政策的精准解构、智能匹配和主动推送,完善由“企业找政策”到“政策找企业”的工作机制,简化办理程序,推动各项惠企政策直达快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祝艳春.江苏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思路和策略[J].商场现代化,2023(13):1-4.

责任编辑:马俊

“八八战略”：系统思维的伟大实践

周琦

(宁波市委党校,浙江 宁波 315000)

[摘要]“八八战略”强调了发展过程中的全局谋划和整体推进,是系统思维的伟大实践。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八八战略”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既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凸显了结构性,又强调了各个要素之间深度协同的整体性。从价值论的角度看,“八八战略”的实施是解决系统性矛盾问题的现实需要,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内在要求,更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必然选择。从实践论的角度看,“八八战略”是一体推进的科学方案,通过进一步发挥区位优势、城乡协调一体发展优势和山海资源优势,在省域关系层面强调内外一体化,在省域内部着眼于城乡一体化和山海一体化。

[关键词]“八八战略” 系统思维 统筹协调 一体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就坚持系统思维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行动遵循。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坚持系统观念”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强调要运用和增强系统思维,提出了系统完善、系统治理、系统集成等要求。立足新时代,面对新征程,必须坚持系统思维,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003年7月10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紧密结合浙江省的特点和优势,在大量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围绕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提出了“八八战略”的决策部署。“八八战略”强调了发展过程中的全局谋划和整体推进,是统筹兼顾的典范,是系统思维的伟大实践。

一、本体论：“八八战略”是内涵丰富的完整体系

系统思维就是既要明晰认识对象是一个由各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构成的有机整体,又要看到作为要素的各个部分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八八战略”涵盖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诸多内容,其所强调的八个方面的优势同八项具体的举措之间又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彰显了“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成事之道。

(一)“八八战略”凸显了系统的结构性

系统总是通过一定的要素及其结构来表现自身,系统的要素结构是系统整体性的前提。“八八战略”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八个方面优势、推进八个方面举措的简称,从发挥体制机制优势、区位优势、特色产业优势、城乡协调发展优势、生态优

基金项目:宁波市党校(社会主义学院)系统2023年规划课题“八八战略的系统思维研究”

(立项编号:2023NDKT11)。

收稿日期:2023-09-20

作者简介:周琦,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宁波党建研究中心(城市党建智库)副主任。

势、山海资源优势、环境优势、人文优势等各个方面,对发展中的各种重大问题作出应对。明确了子要素,凸显了结构性。

从经济建设的角度看,“八八战略”提出要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大力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同时促进全方位融入长三角,并加速推动长三角的数字化建设,共同组建长三角自贸试验区联盟。在此基础上,发挥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加快推动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并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浙江生产总值从2002年的8041亿元跃升至2022年的77715亿元。仅用十年时间,到2013年人均GDP就突破一万美元,跨入了世界银行的国别收入分组标准的高收入门槛。2020年率先施行了《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持续激发民营经济发展的活力,在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2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浙江企业上榜数达到107家,连续24年位列全国第一。这些数字都显示,浙江已经迈入高速增长、高质量发展的轨道。

从政治建设的角度看,习近平同志在2004年10月浙江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上围绕加强党的先进性和执政能力建设,深刻认识并自觉运用共产党执政规律,提出“巩固八个方面的基础,增强八个方面的本领”的党建工作“八八战略”,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角度,对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作出了科学谋划,指明了浙江党建的路径及重点所在。

从文化建设的角度看,“八八战略”围绕加快建设文化大省作出部署安排,着力实现科技强省、人才强省、体育强省等目标,浙江文化软实力不断提升,文化设施已经基本实现城乡全覆盖,县级文化馆和图书馆的覆盖率、乡镇文化站和行政村的文化活动室覆盖率均达100%。在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2021年度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中,浙江文化产业发展综合指数仅次于北京、广东,位居全国第三,这也是浙江连续4年位列前三。

从社会建设的角度看,“八八战略”围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作出部署安排,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办好民生大事、关键小事和急盼难事。从2003年开始,浙江对民生建设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整个十一五期间,浙江财政平均增量的三分之二都

用来改善民生^[1]。2022年浙江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0.9%、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7.2%、全体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8%^[2]。浙江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82.2岁,主要健康指标都位列全国各省市第一。

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看,“八八战略”围绕建设生态环境优美、生态家园和谐、生态文化繁荣作出了部署安排。2019年,浙江通过国家生态省建设试点验收,成为全国首个生态省。建成35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可见,“八八战略”是由各个不同要素构成的系统,这些要素及其结构决定了系统的功能。在实践中,必须科学把握好这些构成要素,才能更好地优化系统结构,发挥最佳功效。

(二)“八八战略”强调了系统的整体性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整体性是系统的本质属性”^{[3]107},只有从整体上把握系统,才能精准认知其结构功能和运行规律。如果片面追求某一方面而忽视其他要素及其关联性,就会形成内部抵牾,从而影响整体成效。“八八战略”的提出本质上是基于对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要求新任务的整体性把握和洞察,其实施成效有赖于各要素间的深度协同耦合。

“八八战略”的内容要素实质上是守正创新、深化改革、攻坚提升的具体抓手,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内在相连、机制相通,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经济建设为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基础,只有按下经济建设的“快进键”,解决了制约发展最突出和市场主体、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不断优化经济环境,才能为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提速增效。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起到统领的作用,党建“八八战略”把推动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协同推进伟大工程和伟大事业。文化建设作为自信自立的力量之源,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明等深度交融,为助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的精神支撑。生态文明建设又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重要保障,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并非相互割裂的存在,大自然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和能量,是经济社会得以发展的前提所在,因而生态文明建设涉及吃穿住行以及文明发展等方方面面重要内容。

由此可见,“八八战略”的整体性表现为对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总体性考察,各内容要素不是简单累加堆叠,而是呈现出非加合性的特质,每一部分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相互关联、彼此呼应,又统一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实践之中,并不断调整优化以达到整体大于部分总和的目标。

二、价值论:“八八战略”是统筹全局的重要决策

在唯物辩证法中,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及其各个要素之间又是相互影响的,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也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有机系统。坚持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才能在统筹全局中着眼于整体目标的最优实践,在精准把握发展趋势中形成战略决策。

从系统思维的角度看,“八八战略”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注重整体和部分、部分和部分、系统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是一个互融共促、良性共生的有机统一体,“八八战略”的提出体现了决策者的全局思维和长远眼光。

(一)“八八战略”是解决系统性矛盾问题的现实需要

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在改革开放前居全国中下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开始一路高歌猛进,率先发展了民营经济、县域经济、外向型经济等,形成的“浙江模式”也引发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但到了21世纪初期,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的问题矛盾和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使得浙江的发展开始进入瓶颈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改革开放越往纵深发展,发展中的问题和发展后的问题、一般矛盾和深层次矛盾、有待完成的任务和新提出的任务越交织叠加、错综复杂。”^[44]比如,当时出现了经济结构的“低小散”、城乡差距的不断拉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等问题,因此急需新的发展战略为浙江引航领路。“八八战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既立足于从整体上回应浙江发展过程中的时代关切,又着眼于全面推动浙江发展实现新跨越。浙江从一个“国家的投资少、大型企业少、人均耕地面积少、物产资源少以及基础设施条件差”的省份一跃成为全国经济强省,在诸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走在全

国前列,就是因为始终坚持以“八八战略”为发展总纲,不断强化顶层设计,一届接着一届干,坚持不懈深入贯彻“八八战略”安排部署。

(二)“八八战略”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内在要求

面对普遍存在的矛盾,如果仅仅从单个矛盾、一般矛盾出发,难以完全解决问题,这就必须要坚持系统思维,既抓住关键因素,又全面把握其他多种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在回顾作出“八八战略”这一决策部署时指出:“我们作出的这一系列决策部署,是党中央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部署在浙江的具体体现,构成了浙江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在这个总体布局中,实施‘八八战略’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总抓手,建设‘平安浙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载体,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举措,建设‘法治浙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效途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此提供根本保证。这‘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内在统一、有机联系、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45]从“总体布局”以及“内在统一”“有机联系”“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等表述中能够看出,“八八战略”进行的是全方位综合思考和全面部署,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内容上相融合、方法上相一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在浙江考察时强调指出的:“‘八八战略’和‘四个全面’在精神上是契合的”^[46]。

(三)“八八战略”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必然选择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是一项庞大复杂、内容丰富的系统工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从领导力量、道路方向、高质量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精神文明、共同富裕、生态文明等九个方面作了阐释。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必须从大局和整体出发,综合平衡各个方面,不能“单打一”。倘若在某一个方面出现薄弱或者滞后,就会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实现的整体进程。只有坚持系统、全面的发展,才能打牢基础、铆足干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

各个方面协调发展,不能长的很长、短的很短。”^{[17]9}面对系统性的课题,“八八战略”以系统性思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整合党的领导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上潮头”,深刻体现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过程中的系统集成性。

三、实践论:“八八战略”是一体推进的科学方案

一体推进的实质就是将原先独立的要素联合起来,形成相互促进、合作共通的发展模式。“八八战略”遵循了一体推进的思维模式,不仅在省域关系层面强调内外一体化,而且在省域内部着眼于城乡一体化和山海一体化,是跨越时空的科学方案、行动指南。

(一)进一步发挥区位优势,参与长三角地区交流合作

“八八战略”从开放、合作、共赢的大格局中实现高层次、高水平的发展。2003年,习近平同志在上海考察时就指出,浙江要着眼于“虚心学习、主动接轨、真诚合作、互利共赢”,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来加强同沪、苏之间的经济交流合作,提出“充分发挥我省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应有作用,共同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一体化,努力在互动共进中实现沪苏浙三省市发展的共赢。”^{[5]108}在“八八战略”的推动下,浙江主动发挥自身在民营经济、数字经济、港口资源、城市治理等方面的优势,打破“楚河汉界”,以己之长促人之长,从产业、市场、空间布局、科创、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对接,从关键节点、核心轴线、重要城市群等各个领域全方位切入,同长三角兄弟省市协同发展、共同进步,达成长三角一体化的战略目标。

(二)进一步发挥城乡协调一体发展优势,加快城乡互促共进

2004年,习近平同志在完成有关调研后提出要进一步认识到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性,并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任务。彼时浙江还存在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为了统筹城乡发展、完善城乡规划,很快浙江省委、省政府就研究并制定了《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浙江成为全国首个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省份。2023年9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

考察时又强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进一步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经过二十年的努力,浙江在“八八战略”指引下,全面提升杭州、宁波和温州等都市区能级,支持培育中心城市发展计划,组团式大力推动城市发展,以此辐射小城市和中心镇的提质升级,同时带动周边农村地区的发展规划,形成“以城带乡”“工农互惠”的一体化发展大格局,浙江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4.5%发展为2022年的73.4%,高出同期全国城镇化率65.22%约8个百分点,浙江在协调城乡发展上走在了全国前列,推动形成了更高水平的城乡一体化。

(三)进一步发挥山海资源优势,山海并用推动欠发达地区发展

山海协作是“八八战略”的重要内容,对山海并立的浙江而言,就是要充分利用好丰富的山海资源优势。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念好‘山海经’,把欠发达地区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作为我省新的经济增长点。”^{[5]209}2003年8月,浙江就发布了《关于全面实施“山海协作工程”的若干意见》,“山”可以理解为浙江西南山区为主的欠发达区域,“海”可以理解为浙江沿海的发达区域,通过山海协作,激发比较优势,从全局高度着力促进浙江省内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协调、共同发展。

“山海协作”在立足各区域原有强项的基础上,着力促进各方优势资源的统筹整合:发达地区通过产业梯度转移及经济带辐射为欠发达地区输送产业、人才、设备等要素,形成技术创新联动;欠发达地区利用劳动力和生态资源,为发达地区提供有效的人力和资源支撑。利用山海协作产业园、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园和飞地园区等发展平台,不仅从经济层面促进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协调发展,更从社会、生态、文化等层面的互利互惠、合作共赢中提升了整体的发展效率。

在“八八战略”指引下,浙江已经成为一体发展的典范。2022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37565元,连续38年位居全国各省区市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倍差连续10年缩小,已缩至1.9(参见表1)。“山海协作”深入实施,山区和海岛地区经济加快发展,2022年,山区26县全体居民、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4560元、56303元和29607元,比上年增长5.7%、4.8%和7.2%,增速分别比全省高0.9、0.7和

表 1 2022 年浙江省城乡居民家庭收入情况

全体居民家庭		城镇居民家庭		农村居民家庭		城乡居民收入比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比上年实际±%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比上年实际±%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比上年实际±%	
60302	2.5	71268	1.9	37565	4.3	1.90

数据来源:浙江政务服务网

0.6个百分点^⑧。

四、结语

“八八战略”是在全面、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展现了决策者统揽全局的战略眼光,也彰显了一体推进的成效,是系统思维的伟大实践。20年来,浙江在“八八战略”的指引下,统筹处理内部与外部、经济与生态、城市与农村、山区与沿海、文化与社会等关系,率先走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未来,浙江将继续坚持“八八战略”,秉承其系统精髓,与时俱进、开放包容,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探路领跑。

参考文献:

[1] 五年 7500 亿元:浙江三分之二财政增量用于民生[EB/OL].(2011-02-27)[2023-09-19].http://www.gov.cn/jrzq/2011-02/27/content_1812237.htm.
 [2] 浙江居民恩格尔系数信息[EB/OL].(2023-01-28)[2023-09-19].<https://>

data.zj.gov.cn/jdop_front/detail/data_preview.do?iid=19285.

[3] 乌杰.系统哲学(修订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5] 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6] 周咏南,应建勇,毛传来.一步一履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纪实[N].浙江日报,2015-05-30.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8] 浙江省统计局.山区 26 县高质量发展持续发力 共同富裕扎实推进[EB/OL].(2023-02-20)[2023-09-19].http://tjj.zj.gov.cn/art/2023/2/20/art_1229129214_5068747.html.

责任编辑:徐书琴



(上接第 11 页)

[5] 江泽民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 胡锦涛文选: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7]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1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1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N]. 人民日报,2021-11-17.
 [1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马俊

“数实融合”发展的基础及进路研究

——以江苏省泰州市为例

王 婷

(泰州市委党校,江苏 泰州 225325)

[摘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和必要路径。“数实融合”发展可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拓展经济发展空间。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走向深度融合,需要实体经济、数智行动、数字基建的三轮驱动。泰州市推动“数实融合”已经具备一定的发展基础,但也存在一些堵点难点。基于此,提出了创新性路径,即探索数据流通机制、打造数字产业集群、建设数字应用场景、实现数字主体转型,以期为泰州市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快车道提供理论支持,促进智慧泰州建设。

[关键词]数字经济 实体经济 融合发展 进路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经济发展动能转换的需求更加突出。推动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伴随数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也是世界各国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重要领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1][30]}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已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的重要工作任务,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之举。

随着数字中国建设的深入推进,全国各地均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视为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着力点,各个城市纷纷制定了“数实融合”发展规划。本文以江苏省泰州市为例,在深刻

认识推动“数实融合”的现实意义的基础上,分析泰州市推动“数实融合”的基础,提出泰州市推动“数实融合”的创新性路径,以期为其他城市推进“数实融合”提供借鉴参考。

一、泰州市推动“数实融合”的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是新的经济样态,“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是重塑企业发展动力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客观要求,是拓展经济发展空间的重要途径。”^[2]泰州市推动“数实融合”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拓展经济发展空间,从而进一步提升城市竞争力。

(一)推动“数实融合”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

数据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要素,打破了劳动力、土地、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的有限供给对企业

基金项目:2023年度泰州市社科联课题“泰州‘数实融合’发展的基础及突破路径研究”[立项编号:SSK2023(S)-29D]。

收稿日期:2023-09-21

作者简介:王婷,中共泰州市委党校讲师。

发展的制约,有效激发企业的内生动力。从企业经营战略角度看,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会引发企业文化、理念、价值和设施等方面的全面变革。就其功能而言,数字技术的融入势必会对企业的产品架构、生产方式及组织架构发挥赋能作用。企业的产品架构方面,数字技术助力企业以高效率、低成本掌握实际消费者和潜在消费者的喜好信息,有助于企业做出正确的生产决策,推动企业经营模式由规模化到小批量、个性化的转变,极大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创新能力。企业的生产方式方面,将互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融入企业的各个生产环节,如设计、制造、管理和服务环节等,实现智能生产。可规避传统人工操作存在的失误,提高产品精密度和质量。企业的组织架构方面,数字经济能够协助企业构建全方位的信息生态系统,实现任何人和物在任何时间地点的信息共享,有效破除传统科层组织结构存在的层级过多、沟通不畅等问题。同时,有效推动企业组织结构从“串联式”到“并联式”的转变,企业组织从“边界清晰”到“无边界”的转变。“无边界”的组织模式可吸纳众多创客在企业平台上创造并共享价值,有助于缩短企业与客户的距离,深挖客户需求,激发企业的发展动力。

(二)推动“数实融合”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客观要求

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供应链的影响》白皮书显示,数字化转型将使制造业企业成本降低 17.6%、营收增加 22.6%;使物流服务业成本降低 34.2%、营收增加 33.6%;使零售业成本降低 7.8%、营收增加 33.3%。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程度的加深,加强了不同产业之间的技术渗透性与互联性,进而衍生出新的运行模式,催生出更多新型的产品供给与消费需求,推动产业转型升级^[1]。一方面,数字技术渗透到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有助于构建完整的数据提取、传输、存储和撮合的流程闭环,畅通产业链的数据流动,构建全新的产业体系;有力促进传统产业由竞争型单元向集合网络转变,推动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虚拟现实等技术集成发展和整体发展。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能够促进产业全方位、全周期的转型。数字化赋能产品研发、生产制造、商品交易、销售管理、物流配送及售后服务等各环节,能够打破传统产业生产要

素空间集聚模式,推动产业生产要素空间向虚拟网络集聚型转变,这对拓宽市场边界、释放消费潜力、推动市场升级发挥重要的作用。

(三)推动“数实融合”是拓展经济发展空间的重要途径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可带动全国创新资源的整合,形成创新竞争新优势。泰州市位于长三角区域核心区南北中轴、江苏地理中心,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承南启北、左右逢源的节点城市,也是长江中上游西部地区的物资中转站,经济发展韧性强、后劲足。尽管泰州市具备独特的区位优势,但依旧存在区域内要素流动受限、高端要素难以集聚等问题,需进一步拓展经济空间。数字经济具备的广覆盖性意味着数字经济具有在广泛产业领域普遍使用的潜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后,从供给端出发,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给生产带来无限可能性;从需求端出发,数字经济的融入突破了交易空间的有限性,拓宽了市场。推动“数实融合”是泰州市拓展经济发展空间的重要途径。

二、泰州市推动“数实融合”的基础

泰州市高度重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泰州市“十四五”发展规划强调,“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数字产业化发展,培育数据要素应用新场景,创新数据要素流通与应用,深化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全市通过充分发挥实体经济优势、开展数智行动、加码布局数字新基建,夯实“数实融合”的基础。

(一)实体经济是“数实融合”的重要依托

经过多年发展,泰州市的实体经济无论是结构规模还是总量质量,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22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 8.5%,位于全省第 4 位;以打造“一个产业体系、四个特色产业集群”为契机,切实做实做优做大了实体经济;建成扬子江药业、济川药业等一批全国医药百强企业,形成了“大健康产业体系”。特别是,化学药、现代中药近 20 个大品种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疫苗产业集聚度全国最高,特医食品注册证数占全省的 3/4,医药产业产值高达 946.2 亿元,约占全省 20%;打造了海工装备和高技术船舶、汽车零部件和精密制造、化工及新材料、光伏和锂

电等产业为核心的“四个特色产业集群”。四个产业集群 786 家规上企业实现产值、销售收入、利润分别为 3810.8 亿元、3493.9 亿元、205.6 亿元,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分别达 45.3%、44.8%、37.3%。经过不断发展,全市实体经济基础更加稳固、稳增长预期持续向好、产业结构更加合理、产业竞争力大幅提升、产业的辐射力和带动力日渐增强,这些都为实现“数实融合”打下良好的基础、提供可靠的保障。

(二)数智行动是“数实融合”的创新动力

近年来,泰州市围绕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大力开展数智赋能行动,在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稳步推进数字经济研发平台建设,目前全市拥有数字经济(电子信息、集成电路等)领域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3 家、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0 家、省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 3 个、市级企业重点实验室 2 家;有力推动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截至 2022 年,全市实施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项目 2468 个、获评国家智能制造优秀场景 3 个、创成省工业互联网平台(标杆工厂)10 个、智能车间(智能工厂)24 个;积极推进泰州市公共数据平台建设,整合 65 个部门 250 多亿条数据、编制 8.9 万个数据目录、对外开放 5399 个数据集,全面推进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城乡四大领域创新应用。

(三)数字基建是“数实融合”的运行基础

近年来,泰州市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速度不断加快。2022 年末,全市有 10G-PON 端口 6.32 万个,全年新增 1.89 万个,比 2021 年末增长 42.6%;建成 5G 基站 7788 座,全年新建 2100 座,增长 36.6%;5G 用户普及率达 38.3%,比 2021 年末提高 12.27 个百分点;千兆宽带用户数达 55.62 万户,比 2021 年末增加 24.27 万户,增长 77.4%。物联网连接数 0.1 亿个,增长 42.9%^[4]。泰州市已经跻身“国家双千兆示范城市”。另外,泰州市全力推进工业企业 5G 融合应用建设,通过建设 5G 融合项目和 5G 工业专网,全力打造状态全面感知、信息高效处理、应用便捷灵活的企业物联网。全市 5 个应用获工信部“绽放杯”5G 应用征集大赛奖、“长城汽车 5G+整车试车创新实践”获“绽放杯”一等奖、中海油被省评定为 5G 全连接工厂。在数字底座方面,聚焦数字资源管理“一本账”,建成全省首个数字资源超市,梳理 196 个部门、826 个应

用、7549 个数据目录,实现了全市云资源、网络资源和组件资源的共建共享共用。

三、泰州市推动“数实融合”的创新性路径

要打造韧性智慧的现代活力之城、激发新质生产力,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必须抢抓发展风口,加速推进“数实融合”发展,推动数字泰州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

(一)坚持发展与安全有机统一,建立数据流通机制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是重要的新型生产要素。数据只有实现流通才能创造更大的价值。建立数据流通机制既是公共数据价值实现的必然性要求,也是“数实融合”的创新性路径。

1.建立数据资源流通共享机制

数据资源在本质上是一种客观存在,只有实现流通共享才能创造价值。数据资源的流动共享不是无序的流转,而是在外力干预下按照一定规律实现一定目的的过程(见图 1)。要依赖强大的算力支撑从海量的数据资源中汲取有价值的部分,再通过数据共享平台进行脱密并输送到数据使用主体。使用主体通过再生产产生出新的数据再进行算力计算进而筛选出有效数据,进行下一步循环。因此,建立数据资源流动共享机制的着力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构建数字技术供给机制。增强企业数字技术创新主体优势,充分发挥企业作为数字技术创新决策、科研组织的主体作用,并对其实施更大力度普惠性政策,提高企业数字技术研发创新能力^[5]。其次,建立数据回流共享机制。落实专人定期对省级政务数据回流清单进行梳理。以每周或每月为周期,对照省共享平台资源进行线上申请,同时向市级相关部门派发对口申请任务单,确保省级数据及时、准确、有效回流泰州市。最后,建立数据服务平台。在现有公共数据平台基础上,完善数据供需对接体系,提高数据配置能力。勇于打破“数据孤岛”,政府可尝试将涉密数据进行脱敏、脱密处理后向社会开放。同时,联合高校、科研院所、行业龙头及社会力量共同助力完善数据服务平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有序推动公共数据向社会分类分级开放,有效支撑应用创新和数据要素价值发挥。

2.建立数据安全保障机制

数据既有丰富的战略价值,但同时也是最脆弱的资源^[6]。数据安全风险的危害性和外溢性可能

涉及个人、公司、城市甚至是国家安全,因而,有必要建立全流程的数据安全保障机制。一方面,建立数据安全制度保障体系。以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为依据,确定数据产生、使用、流通各环节的责任主体,建立健全数据安全监管和审查制度,完善责任追究机制在内的各项配套制度,制定数据流通和交易负面清单,形成数据安全制度保障体系。另一方面,完善数据安全保障机制。建立数据安全保障领导小组,整合政、产、学、研等数据流通相关主体,建立包含数据标准、数据使用协议、数据保密协议、应急响应预案等要素在内的数据安全保障机制。加快身份管理、APT 攻击防御、DDOS 攻击溯源等关键技术研发,运用底层算法,探究其中的价值观,提升风险防范水平,规范监管机制,提高算法管理水平,实现数据监管。

(二) 坚持整体提升与重点打造相互协调,打造数字产业集群

不同实体企业在经营状况、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禀赋水平、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数字化发展程度也参差不齐。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促进重点领域发展与全面提升行业整体数字化能力,以点带面,大力推动“数实融合”赋能数字产业集群建设。

1. 整体提升数字产业化水平

一方面,主动融入长三角先进数字产业集群。根据长三角产业分布地图,从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全要素链视角进行资源调配和统筹安排,与其他城市形成差异化的数字产业集群。泰州市应当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在省内,加强与苏州、无锡等优势资源要素集聚区的通联;在省外,积极与上海、浙江等数字经济发达地区接轨。对标长三角产业链,自身开展“查漏补缺”,实施产业链补链行动,在实现数字产业链与长三角产业链相融合的

同时,推动数字产业化水平的整体提升。另一方面,全力实施“数智赋能”专项行动。围绕万物智联强市、数字新基建催生新动能的总体目标,对标《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标准和要求实施“智改数转”工程,以“一体四集群”产业为切入点,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为抓手,实现工业物联、数联、智联一体化推进,夯实产业基础、提升产业现代化水平,着力打造长三角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及应用先行示范区。

2. 重点打造工业互联网龙头企业

一方面,找准定位,加大企业培育力度。按行业类型建立企业培育目录库,将位于价值链高端的龙头企业和数字化改造示范标杆企业纳入培育目录,结合企业特点制定包括政策帮扶、资金配套、资源支持等在内的个性化培育方案,制定分阶段的考核标准,推动龙头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用好“双招双引”,激发企业潜能。用好市级招商引资平台,围绕数字化和产业链招商,招引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创新人才招引方式。根据数字人才需求预测分析数字人才引进和培养的数量、要求和目标,采取聘请顾问、兼职挂职、定期服务、课题招标、技术合作开发等多种灵活方式大力开展人才招引工作,为龙头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资源支持和动力支撑。

(三) 坚持供给与需求双向匹配,建设数字应用场景

数据资源的价值需要场景化应用才能实现“加法效应”和“乘数效应”。塑造数字应用场景是供给端和需求端互动的过程,需要发挥政府职能、强化资源供给、面向市场需求,在数字应用场景中将数据资源的价值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1. 发挥政府职能,系统化设计数字应用场景
数字化应用场景有其固有的运行规则,更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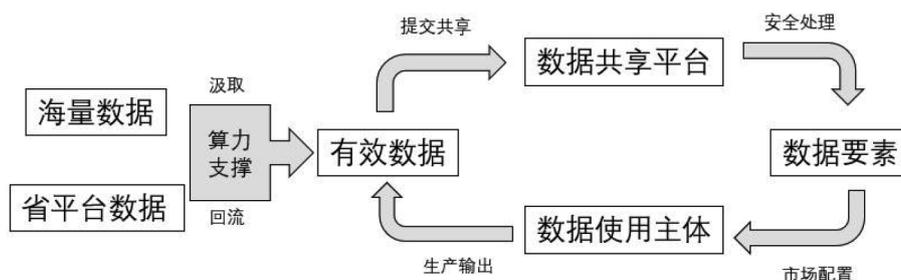


图1 数据流通的全过程

一个开放的体系,需要与其他应用场景沟通互联。系统化、体系化场景构建是数字应用场景的根本诉求。塑造数字应用场景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一方面,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塑造体系化数字应用场景。将交通、能源、农业、教育等不同场景,全面应用于企业、园区、旅游景点、医院、学校、政府、乡村等,并建立连接。另一方面,用好政府职能优势,塑造立体化的数字应用场景。在大力推进公共文化、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养老服务等社会事业的基础上,将医疗、教育、智慧社区、就业创业、智慧养老等模块纳入数字应用场景,大力提升应用质量和水平。此外,政府部门和有关组织要不断完善政务信息系统,着力打破部门和地区间的信息壁垒,运用互联网思维和数字技术创新服务模式、优化政务流程、拓展功能边界,在更大程度上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2. 强化资源供给,打造数字生活消费新场景

一是满足消费升级的需求,引领高品质数字生活。聚焦消费新领域,打造数字生活消费新场景,如深挖大健康产业,打造健康养老场景,深挖旅游产业,打造5D、VR博物馆等等,打破泰州市零供给局面。二是促进生产供给与人民需求精准对接,推动高质量发展。通过大数据技术分析消费者喜好,实现生产订单与群众需求的精准对接,促进企业实现零秒响应生产模式,倒逼企业提高产品的标准和质量。三是促进数字技术供给与数字技术需求融合,拓展数字应用场景。深入基层调查了解群众迫切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充分利用泰州市公共数据服务平台,改善信息不对称、提升数据流通效率,促使企业创新产品,政府完善服务内容,拓展数字应用场景。

3. 面向市场需求,提升数字应用场景能级

一是推动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在做好应用场景覆盖面和受众面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大力强化“医、药、养、食、游”等全产业链的场景建设,并实现扩点成面,形成规模效应。同时大力建设交通运行监测、大健康数据监测、数字旅游等场景,积极拓展更加丰富立体的应用场景。二是推动场景功能提升。深化与扬子江药业、新浦化学、新时代造船等龙头企业及本地优秀企业合作,大力推进新技术研发和新产品应用,推动场景建设迭代升级;加大“小而散”平台整合力度,强化一体设计、数据

整合和系统集成;树立用户思维、优化用户体验、增强用户黏性,推动场景功能优化拓展。三是推动场景体系完善。有效推动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协同联动,着力提高场景开发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前瞻性,规避重复建设、多头建设;从硬件、软件、机制等方面综合发力,加快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算力基础设施及融合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全力打造高度集成、动态更新的泰州市数字底座。

(四) 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共同发力,实现数字主体转型

数字主体转型是一个从被动转为主动的长期过程,需遵循“由点及面、长期迭代、多方协同”的思路。在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的共同作用下,逐步推动企业、行业、园区数字化转型。

1. 以智能制造为重点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一方面,推动企业实现基础性改造。政府职能部门带领行业龙头企业经营者成立商务团队,梳理企业发展瓶颈和业务难题,与技术发达城市洽谈合作,引入低成本、模块化的设备和系统,对企业工业互联网实施基础性建设和改造。另一方面,推动企业实现技术性改造。运用云计算、物联网和自动控制等新兴技术,着重对船舶类重工企业进行改造,借助“机器换人”契机优化更新机器设备,实现“无人车间”和“无人工厂”的改造目标;对于光伏行业、大健康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流程进行改造,加快企业将核心业务上“云”步伐,推动企业生产由单机转向网络化、联动化,大幅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

2. 以平台赋能为重点推动行业数字化转型

一方面,推动工业互联网关键资源与工具的共享。充分运用泰州市5G+工业互联网平台为当地中小企业提供更加便捷的数字化途径。针对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建立分类分库的软件工具箱、行业数据库和物理模型,促进工业互联网平台与企业的精准对接,进而实现资源与工具的共享。另一方面,推动企业建设自主可控数字化赋能平台。在全市工业互联网现有技术设施基础上,发展跨企业、跨行业、跨区域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提升数字化平台的普惠性,给实力较弱的企业提供数字化“入场券”,为实体企业存储、处理、应用数据提供支撑,强化企业经营者建设自主可控数字化平

台的信心。

3.以生态建构为重点推动园区数字化转型

园区是实体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园区数字化转型可大幅度提升园区运营的稳定性和管理的有效性。一方面，通过完善园区数字化基础设施推动园区数字化转型。大力推动基础通信运营商与各类产业园区开展深度合作，给予园区数字化配套补助，激励园区及时更新软件系统平台及机房硬件设备，针对园区产业特色和重点企业分布，加紧智慧园区 2.0 和 3.0 建设。另一方面，通过打造数字化平台推动园区数字化转型。以企业发展需求为中心，推进产业集群、特色小镇、产业园区等数字化服务平台建设。发挥数字技术赋能效应的同时，始终坚持实体经济的主体地位，推动实体企业存储、整合、使用、生产数据的全过程实现“智慧化”“智能化”。避免数字平台与产业发展“两张皮”的现象。与此同时，建立园区统一数据收集、处理和使用标准，提高运用技术的能力，将数字技术创新融入园区产业治理、风险防范之中。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

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 习近平. 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J].求是,2022(2):2-6.

[3] 钞小静,王宸威.数据要素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微观视角的经验证据[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2(4):109-122.

[4] 王钟.抢抓发展风口 大力推动泰州数字经济发展[EB/OL].(2023-08-07)[2023-09-20]<https://mp.weixin.qq.com/s/ij76UUoamxvaCcb1Xdc04A>.

[5] 任晓刚,方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驱动机理、制约因素与路径选择[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12):108-111.

[6] “Data is the World’s Most Valuable (and Vulnerable) Resource”, TechCrunch, March 5, 2021. https://techcrunch.com/2021/03/04/data-is-the-worlds-most-valuable-and-vulnerable-resource/?guccounter=1&guce_referrer=aHR0cHM6Ly93d3cuZ29vZ2x1LmNbS5oay8&guce_referrer_sig.

责任编辑:徐书琴

(上接第 6 页)

[2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21] 列宁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2] 黄炎培.延安归来[M].北京:国家行政管理出版社,2021.

[23] 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24] 习近平.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J].求是,2023(13):4-16.

[25] 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26] 列宁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7] 毛泽东文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8] 毛泽东文集:第 5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9] 王玉堂.读写研讲:新时代基层党校工作的探索与实践[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国家行政管理出版社,2022.

[30] 王玉堂.发扬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J].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22(4):3-7.

[31] 江泽民文选: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朱少家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 实践及现实启示

祝猛昌 韩璐

(北京理工大学,北京 100081)

[摘要]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注重纪律建设是由自身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决定的,是对党的优良传统的发扬,是实现全面抗战时期党肩负的历史使命的迫切要求,与张国焘、王明等人违反党的纪律的言行和中国共产党大量发展党员的过程中由于非无产阶级成分进入党内等给党的纪律建设带来一定的挑战有密切的关系。围绕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党的纪律教育,正确处理发展党内民主和巩固党的纪律的辩证关系,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通过对典型的违反党的纪律案件的处理推动党的纪律建设。中国共产党通过纪律教育夯实了全党遵守党的纪律的思想基础,通过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为维护党的纪律提供了制度保障,对新时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全面抗战时期 中国共产党 纪律建设

党的纪律主要指已经由党内法规和党内一般性制度文件明文规定的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全面抗战时期,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是党的建设过程中必须抓牢抓好的重大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在纪律建设问题上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取得了重大的成效,为新时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视纪律建设的原因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纪律建设

马克思主义政党高度重视纪律建设。在领导

或指导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要重视纪律建设。马克思指出:“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1][43]}。列宁更是指出:“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是无产阶级顺利地进行革命斗争的必要条件之一。他还指出:“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2][24-25]}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注重纪律建设,全面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深刻认识的。1941年,刘少奇在《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的报告中指出,无产阶级战斗力量的根本来源就在于“无产阶级有很好的组织与纪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深化对‘五个必由之路’规律性认识研究”(立项编号:23ZDA135)。

收稿日期:2023-09-21

作者简介:祝猛昌,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韩璐,山西大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律。”^[3302]他认为共产党不仅有思想上、原则上的一致,还有组织上、纪律上的一致,这是一切党员的行动“能够最高的统一起来”的必要条件^[3302]。刘少奇的论述深刻揭示了党的纪律与无产阶级战斗力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政党要高度重视纪律建设具有深刻认识的重要体现。

(二)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纪律建设是对党的优良传统的发扬

中国共产党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领导革命,反革命力量极其强大,这决定了中国的革命必然是长期的、残酷的,没有严格的纪律是难以取得成功的。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明确指出:“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401]大革命后期,为了加强纪律建设,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经过选举产生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为加强纪律建设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体制机制保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党内巡视制度,充分发挥巡视利剑在维护党的纪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1931年1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指出:“严紧党的纪律反对官僚腐化现象;严格执行党的铁的纪律,是严密并巩固党的组织,提高党在群众中威信的方法。”^[5477]纪律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加强自身建设高度重视的问题,对全面抗战时期党的纪律建设必然会产生重要影响。

(三)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纪律建设是实现党肩负的历史使命的迫切要求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扩张的加剧,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进行第二次合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革命面临新的错综复杂的形势。这要求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对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提出了迫切的要求。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无产阶级经过

它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62638]8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他再次强调:“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6278]毛泽东的论述立足于中国革命进入新阶段、面临错综复杂的形势,反映了我们党对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与加强自身纪律建设辩证关系的深刻把握。

(四)全面抗战时期纪律建设面临挑战是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纪律建设的现实因素

全面抗战时期,党的纪律建设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王明、张国焘为代表的极少数领导干部违反纪律,给党的纪律建设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1937年11月29日,王明受共产国际派遣从苏联回国。12月9日至14日,为了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检讨抗战以来党的路线等问题,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会上王明批评了洛川会议以来中央采取的正确方针,提出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主张。12月18日,周恩来、王明等率领中共代表团抵达武汉。12月23日,中共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将代表团与长江局合并,对内称长江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王明参与长江局领导工作以后,在一系列言论和活动中,右倾错误进一步发展,甚至有时违背党的纪律,擅自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宣言和谈话,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除了王明,还有张国焘。1938年4月2日,张国焘以祭黄帝陵为名,未经中央允许,擅自跑到西安,拒不听从党中央的劝导,脱离革命队伍。张国焘是党的一大代表,也是党的高级干部,这件事情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王明、张国焘的言行使得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显得极为必要。

另一方面是全面抗战时期大量发展党员使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也涌入党内,严重影响党内纪律的巩固。全面抗战爆发后,为着全民族抗战的胜利和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党中央作出了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并得到了全党的积极贯彻,党员人数迅速增长,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得到了极大的增强。但是,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获得大量发展的同时,各种非

无产阶级成分也纷纷涌入党内，特别是以自由散漫为主要特点的小资产阶级错误思想也侵入党内。同时，由于在大量发展党员的过程中，党的建设没完全跟上，也加剧了各种错误思潮在党内产生的负面影响程度。因此，1939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为着巩固党，必须提高党的纪律和加强党的团结。必须在党内开展正确的思想斗争，保证党内思想上的一致，提高党的铁的纪律，保证党的行动上的一致^[7]。纪律建设成为全面抗战时期党的建设必须抓好的重要工作。

二、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主要举措

(一) 高度重视党的纪律教育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回顾了党的奋斗历史，在深刻阐述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必要性以及党的纪律的主要内容的同时，毛泽东强调了加强党的纪律教育。他指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应该根据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给全党尤其是新党员以必要的纪律教育。”^{[8]651-652}在《论党内铁的纪律》一文中，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李维汉也指出：“自觉的纪律的建立，要依靠于党内纪律的教育。”^[9]六届六中全会后，围绕着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其中指出：“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应经常开办各种干部训练班，应以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党的建设与游击战争作为教育计划的中心内容”^{[10]72}。中央宣传部发布的《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内党支部教育的指示》也指出：“支干的政治教育，一般的应当包含：党的建设初步（党章的教育），以中国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常识”^{[10]513}，等等。纪律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时期党内教育中有深刻的体现。

(二) 发展党内民主以巩固铁的纪律

全面抗战时期，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想是巩固党的铁的纪律的重要阻碍因素。但是，由于党内民主发扬不够，在党内也造成党员对纪律的机械服从、惩办主义等现象，这对形成铁的纪律也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在六届六中全会《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强调：“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他还认为：“无论在军队或在

地方，党内民主都应是为着巩固纪律和增强战斗力，而不是削弱这种纪律和战斗力。”^{[8]652-653}正确处理党的纪律和发展党内民主的关系成为这一时期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问题。如在陕甘宁边区，1939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党的工作》的报告中，李富春强调了要发扬党内民主，强调“发扬民主正是为着更能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更能巩固党的领导。”^{[11]561}1938年12月24日，华北地区最大的党组织——中共晋冀豫区委扩大会议反思了发展党内民主问题上存在的不足，强调要正确处理党内民主和维护党的纪律之间的辩证关系^{[12]121}。1939年1月28日，在太岳全区工作的总结与计划中，发展党内民主成为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问题^{[13]109}。1939年1月，在中共晋豫地委的组织报告中，“扩大党内民主，提高党的纪律，加强党内团结”成为今后组织工作的方针^{[13]200}。发展党内民主以严格党的纪律，是全面抗战时期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举措。

(三) 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以严肃党的纪律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为纪律建设提供制度保证。如为了保证大量发展党员的同时，党的纪律不受到影响和冲击，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征收党费的通知》^{[8]469-471}，其指出：“经常交纳党费及物质上帮助党是布尔塞维克党员应绝对遵守的义务，也是构成布尔塞维克党员资格的条件之一。”《通知》还明确规定了不同情况交纳党费的具体要求，并首次规定了建立党费报告制度。党费反映了党员与党的密切关系，党员是否按要求缴纳党费是一个政党组织性纪律性的重要体现，建立和完善党费征收制度是党的纪律建设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此后，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等党内法规。《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对中央委员会在党内的崇高地位作了说明，对中央委员会开会的条件、决议的通过、中央委员会的职责、中央委员会委员应该遵守的纪律等作了深入的说明。该《决定》对中央政治局的地位、职责、政治局委员应遵守的纪律等作了深入的说明，对中央书记处的地位、职责、书记处成员应遵守的纪律等作了深入的说明。该《决

定》对各中央局及中央分局的地位、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委员应遵守的纪律等也作了规定^{[8]760-765}。《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对各地党的代表大会的召开、各级党的委员会的产生、各级党委的工作程序、各地同级党委之间的关系、各级党的委员会委员和党委及党的负责人应遵守的纪律及违反党的纪律的处置程序等作了明确的规定^{[8]766}。《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强调了由各中央局决定,在区党委之下,得设监察委员会并规定了监察委员会的职权等^{[8]770}。上述党内法规的通过,对维护党的纪律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此后,1940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地方党及军队中党务委员会工作的决定》,规定了党务委员会的产生、党务委员会在处理个别党员和解决党内纠纷问题必须履行的手续、遵循的工作程序和承担的重要职责,明确了党务委员会在维护党的纪律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等^{[10]578}。这对于党的纪律建设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通过对典型的违反党的纪律案件的处理推动党的纪律建设

1937年10月,具有光荣斗争历史的共产党员、红军干部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开枪把刘茜打死。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判处黄克功死刑。黄克功被判处死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执行党的纪律上没有特殊党员。除了黄克功案,刘力功案和刘振球案也是全面抗战时期党的纪律建设中的典型案例。刘力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进入了党的训练班。毕业时,刘力功不服从组织分配且不接受党的教育、不改正自己的错误,因此,组织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公布于全党。刘力功案件发生后,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发表了《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的文章,清楚解释了刘力功案件的详细过程,阐明了党员对于党的纪律应有的正确态度^{[14]26-32}。中央组织部还组织延安各机关、学校围绕“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开展了一场大讨论。干部、学生纷纷从刘力功事件中检查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延安出现了“三多三少”的现象:讲个人要求的少了,服从组织分配的多了;图安逸比享受的人少了,要求到前线和艰苦地方锻炼的人多了;自由主义现象少了,严守纪律的人多了^{[15]293-294}。参加过五次反“围剿”的革命功臣刘振球居功自傲,贪污腐化,而且拒绝党的批

评、教育、挽救。党务委员会为着巩固党,严明党的纪律,开除了刘振球的党籍,交法庭处理^[16]。刘振球案发生后,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兼军委直属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发表了《拥护开除刘振球的党籍 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17]一文,说明了刘振球的穷苦出身和光荣的革命历史,分析了刘振球违反党的纪律的表现和原因。胡耀邦强调如果党员感觉到党的利益同个人利益有矛盾的时候,必须服从党的利益;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忠实于党决不是口头上的空喊;等等。

三、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

(一)通过纪律教育夯实了全党遵守党的纪律的思想基础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自由主义等错误的思想倾向必然会对党员干部遵守党的纪律造成严重的挑战。“这些不正确的观念,如果反映在地方工作上,就会形成自私自利,贪污腐化,散漫自由,破坏决议,违反纪律,压抑民主,压抑群众,高傲自大,追逐表面成绩,满足现状,或是终日在名利地位上追求,或是应付了事,推一推动一动,不推不动,甚至悲观失望消极怠工,或是逢迎上级,只说漂亮话风凉话,出风头,不做实际工作的两面派态度等等。这些东西在工作中,只有阻碍工作任务的完成和妨碍实际效果的获得。”^{[12]207}因此,围绕着维护党的纪律,纪律教育成为一项基础性工作并得到了广泛的实施。比如在中共晋冀豫区委,1939年1月通过的工作计划《关于目前工作任务的决定(节录)》把纪律教育摆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该《决定(节录)》特别强调:全党同志首先是干部必须遵守党规党法,各级党校与党的训练班中,应把党规党法列入党的建设中的一课^{[12]135}。在陕甘宁边区,1939年9月21日,边区党委组织部在《关于今后组织工作的指示信》中也深刻地指出:要从教育的基础上开展反不正确倾向,克服一切不良现象。今天在党内开展反贪污、反紊乱的男女关系及右倾思想、自由主义还是很重要的工作^{[11]311},等等。普遍而深入地开展纪律教育,为全体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遵守党的纪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在执行党的纪律的过程中清除了严重违反党的纪律的党员干部

本着严格执行党的纪律的原则,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张国焘、刘力功、刘振球等作出

了开除党籍的严厉处分,依纪依法严惩黄克功。除上述外,针对大量发展党员的过程中带来党员成分的不纯给党的纪律造成挑战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清理了严重违反党的纪律的党员干部。比如在太岳革命根据地,对政治思想觉悟不高、不过党的组织生活、不做党的工作、不受党纪约束、不缴纳党费的党员,停止组织关系,其不愿出党者给予劝退,等等。以太岳第三地委为例,全地区共有基层支部 137 个(其中农村支部 119 个)、独立小组和个别关系 142 个,共有党员 2061 名。在 1940 年至 1942 年,经过整顿的农村支部 71 个,占农村支部总数的近 60%;党员受开除党籍处分的有 27 名,停止组织关系的有 24 名,受留党察看、警告和批评处分的有 29 名,受处分的共计有 80 名^{[13][33]}。这种情形在党领导下的其他根据地也有体现,对严肃党的纪律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通过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为维护党的纪律提供了制度保障

全面抗战时期,围绕着严肃党的纪律,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被摆在了重要位置。1938 年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强调“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六届六中全会制定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重要文件,在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和纪律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这些党内法规为党的纪律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除此之外,1938 年《关于征收党费的通知》、1941 年《关于党费的决定》以及 1940 年《关于地方党及军队中党务委员会工作的决定》等重要党内法规同样为党的纪律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为党的纪律建设的法制化、程序化、规范化奠定了基础。

四、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现实启示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诸多举措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并取得了切实的成效,对新时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一)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把纪律挺在前面

全面抗战时期,由于党肩负着领导全民族抗战并取得最终胜利的历史重任,由于以王明、张国焘为代表的极少数党员干部对党的纪律的破坏,由于大量发展党员过程中非无产阶级成分加入党内导致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想观念和不良作风侵蚀

党的肌体,党的纪律受到严重挑战。中国共产党加强纪律教育、正确处理发展党内民主与巩固党的纪律的辩证关系、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对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进行惩处,这对维护党的纪律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历史使命,这需要中国共产党坚强而有力量,对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迫切要求。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把纪律挺在前面。这是因为如果不严明党的纪律,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会大大削弱。如果纪律不严,全面从严治党也就无从谈起。只有严明党的纪律,才能保证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高度一致,才能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最终实现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奠定坚实的政治思想组织基础。

(二)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要深刻认识到坚决执行党的决议是遵守纪律的第一要求

党的纪律是党内拥有制定党内法规权力的机关根据党的章程制定和颁布的、运用党纪处分的手段保障其实施的、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全面抗战时期,极少数党员乃至党的高级干部,并非不知道党的纪律,但他们在实际行动中却违反乃至严重破坏党的纪律。对此,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强调迅速确切地执行党的决议是维护党的纪律的根本要求^{[14][30]}。党的纪律被遵守与否,关键看行动。因此,新时代,在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过程中要看党员干部对党的纪律的态度,更要看全体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在行动上能否遵守党的纪律。要通过党的纪律教育使每个党员懂得,只有坚决执行了党的决议,才算真正遵守了党的纪律。

(三)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要纠正极端自由化和惩办主义等错误倾向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巩固党的过程中高度重视党的纪律建设,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非无产阶级成分进入党内造成了自由散漫的思想倾向乃至极端的民主主义,极少数党员干部自行其是,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因此,新时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同样必须高度重视类似的错误思想倾向给党的纪律带来的挑战。全面抗战时期,党内还存在着极少数领导干部和党的组织以执行党的纪律的名义,对党员干部乃至党的相关组织进行不正确的处理,(下转第 48 页)

以大历史观科学把握马克思恩格斯 俄国村社思想之“异同”

王振杰

(河南省委党校,河南 郑州 451000)

[摘要]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借助于对俄国民粹主义问题的思考,开始重新调整思路并着手进行新的理论构想,最终对于求解俄国社会发展道路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作出了新的历史贡献。恩格斯与马克思围绕俄国村社问题的相关论述,尽管存在视域和论述侧重点的不同,但是在基本立场与思维方法上却是一致的,二者相互辉映、互为补充,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的有机统一。因此,要从大的历史观视野来审视马克思恩格斯俄国村社思想之“异同”,从而对马克思恩格斯俄国村社思想之关系进行科学的评价与定位。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 俄国村社 大历史观

长期以来,关于在俄国村社问题上恩格斯与马克思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国内外学界一直有很大的争议。总结起来大致有两种论点:一是“对立论”,即认为恩格斯晚年对俄国村社性质的解读和对俄国村社发展前景的判断与马克思早年提出的观点存在严重的偏差,并由此认为恩格斯晚年对他们二人早期提出的观点进行了“修正”^①。二是“互补和完善论”,即认为恩格斯晚年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深刻洞见,在一些具体的表述上的确与马克思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这并不能作为二人对立的证据,反而应当看作恩格斯根据时代环境和革命形势的变化而作出的及时调整,非但不

存在所谓的“修正”,反而是对马克思已有观点的完善和发展^②。笔者认为,对马克思恩格斯俄国村社思想之间相互关系的考察不能陷入“两个绝对”的怪圈当中,即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村社发展前景的看法存在绝对的一致性或绝对的差异性。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俄国村社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探索,并做出了一些新的解读,这当中确实有一些观点与他们早期的论述存在不相一致的地方。但是承认差异,并不意味着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俄国村社问题的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论是一致的,阐述的观点也是一致的、互补的。因此,“互补和完善论”才是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唯物史观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规律研究(1919-1949)”

(立项编号:20CZX008)、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新时代青年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认同研究”(立项编号:2023CKS047)暨河南省社科联年度调研课题“构建网络空间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机制研究”(立项编号:SKL-2023-61)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23-09-20

作者简介:王振杰,中共河南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讲师,法学博士。

符合客观事实的科学判断。

一、马克思恩格斯在俄国村社问题上的两种不同思路

马克思恩格斯在俄国村社问题上的看法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对于他们观点之间一致性的强调是驳斥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必然选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所有看法都是一致的,毕竟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更不必说他们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个体。事实上,由于时代环境的差异性和侧重点的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在与俄国民粹派的论战策略、对俄国村社的内部因素以及俄国革命的看法上演化出两种不同的思路。

(一)与俄国民粹派的论战策略存在些许的差异

在对待民粹派的错误观点时,马克思的态度较为委婉,而恩格斯的方式则较为直接。在面对以赫尔岑为代表的民粹主义者忽视俄国村社本身所包含的落后的经济状况、封建性以及孤立性等行为时,恩格斯给予了直接的回击,马克思则对民粹主义者所提出的一些主张表示支持和理解,但这样做的目的是扭转民粹派在俄国所面临的不利局面,同时对“西欧派”所提出的俄国应当不顾一切发展资本主义的观点进行回击,更是为了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保存俄国村社。此外,马克思支持的只是民粹派所提出的一些蕴含进步思想的主张,如民粹派对俄国村社本身所包含的积极性因素的挖掘和对国家专制主义的反抗等等,而对于他们一再否认俄国村社可能转化为高级形式的观点,马克思则是坚决反对的。在俄国革命形势较为高涨的时期,马克思对民粹派的错误观点采取一种较为委婉的批判态度,可以理解为是对民粹主义者革命积极性的保护。在马克思看来,与纠正他们的错误观点相比,民粹主义者的革命热情以及俄国革命活动的顺利开展则更为重要。马克思逝世之后,民粹派的空想社会主义观点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的巨大障碍,更为关键的是,这些观点的存在,严重干扰了俄国村社的正常发展轨迹。这并不是说民粹派的唯心主义观点在马克思生前那一时间段内就是完全进步的,只是两个时期相比,民粹主义在后一时期所产生的危害性更强,俄国村社所处的时代环境也更为不利。正是这一内外部条件的变化决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待俄国民

粹主义的不同方式和不同态度。马克思无论是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还是在给查苏利奇的通信中,所要解决的都是由米海洛夫斯基所引起的将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绝对化的问题。因此,马克思回应的内容自然要侧重于强调俄国村社转化为高级形式的可能性。而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在相关论战中所面对的主要是一味强调俄国村社以及俄国社会独特性的观点,因此,恩格斯的回应也就侧重于对俄国村社落后性一面的揭示以及对俄国社会形态演进过程中现实性基础的强调。此外,导致这一“差异性”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不同分工。1877年1月在《论住宅问题》的第二版序言中,恩格斯提出,为了使马克思安心完成《资本论》的创作,他和马克思进行了不同的分工,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应付一些敌对的见解,并在一些主要的期刊上公开发表他们的主张^{[3]399}。由此也可以解释,为何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待俄国民粹派的错误观点时会有不同的反应。可以设想,如果马克思面临同样的发展现实和同样的“任务”,也会对这些错误观点予以直接的回击,并作出和恩格斯同样的判断。

(二)在对俄国村社内部因素的看法上存在不同的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在俄国革命高涨的时代都希望俄国能与欧洲革命相互配合从而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但这种希望更像是一种心理上的偏向性,终究不能代替对事实的理性分析。在考察俄国村社避免解体的可能性时,马克思恩格斯坚持的一贯前提是俄国村社的发展是否可以满足它的各个成员的需要。在恩格斯晚年,俄国村社面临的内外部压力已使它难以保存,更不必说满足其成员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都同意只要俄国村社能够保存下来,就不排除它过渡到高级形式的可能性,区别在于,恩格斯晚年时期根据俄国发展变化了的现实条件,提出了俄国村社趋于解体的必然性。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应各国社会主义者邀请,指导各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俄国村社问题也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这一时期,俄国无论是村社的解体趋势,还是资本化趋势都已十分明显。因此,与马克思相比,恩格斯寻求解决俄国村社问题的方法,更倾向于对俄国村社所面临困境的论述。例如,恩格斯提出,俄国一些社会主义者口中的“上帝选民”的时代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俄国的

土地占有制形式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过以及俄国村社在自身基础上无法实现向高级社会形态的过渡等等。在这些问题上马克思倾向于如何在保存公社的同时,又能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跨越性发展,因此更多地强调俄国村社内部的有利因素。而恩格斯则更多地站在事实分析的角度,实质性地指出村社存在的诸多问题,从而强调其解体的必然性。也可以理解为,马克思认为俄国村社在诸多有利条件下具备转化为高级形式的可能,而恩格斯也同意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但是认为俄国村社解体的可能性要大于其实现向高级社会形态过渡的可能性。从另外的角度来讲,马克思强调的是俄国村社只有在不断进化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因为这一时期,尽管俄国村社也面临种种不利的局面,但是距离解体似乎还有很远的距离。而在恩格斯晚年时期,资本主义在俄国已不再是初级的发展程度,村社的解体趋势也更为明显。显然,这一时期俄国村社所面临的第一要务已不再是如何实现向高级社会形态的过渡,而是如何避免解体的命运,因为只有先生存下来才有机会去探讨如何获得更好的发展。

(三)对于俄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之间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解

在马克思的早期论述中,俄国革命是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这一时期的俄国,无论是国家的财政状况还是人民的生活状况都到了崩溃的边缘,因此,整个斯拉夫民族都处于革命的前夜^{[4]622}。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突出强调俄国革命的积极作用,认为俄国革命的有效开展不仅可以挽救俄国人民于水火之中,还可以对欧洲革命甚至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马克思逝世之后的十几年间,他们期待的俄国革命非但没有发生,沙皇的专制统治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因此,在这一时期,恩格斯强调俄国民粹主义者应当及时摒弃将俄国村社、俄国农民以及俄国劳动组合形式的独特性无限夸大的做法,认为仅仅依靠俄国自身的力量已无力实现俄国人民的解放,唯有借助于欧洲革命的推动才能使俄国尽快摆脱困境。而欧洲革命的爆发自然不会凭空产生,也需要俄国革命的助力^{[5]502},这就牵涉到俄国革命与欧洲革命谁先谁后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恩格斯认为,推翻沙皇统治是这一时期俄国的首要任务,也可以理解为,俄国革命在先。在将俄国

农民从贫穷和被压迫的状态下解救出来以后,俄国革命将会加速欧洲革命的爆发。由于欧洲拥有较好的生产力基础,欧洲国家将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俄国也将获得充足的物质和技术支援。在这一切的设想中,俄国革命的率先爆发和欧洲革命的示范效应一个都不能少,只是相较于马克思早期对俄国革命推动作用的强调,恩格斯晚年更多地立足于俄国已经发展变化了的现实环境,强调欧洲革命所产生的“示范性作用”。

二、马克思恩格斯探究俄国村社问题立场的根本一致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俄国村社问题的看法上存在着视角上的差异和侧重点的不同。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不应当根据论述上的些许差别,就断言他们的观点之间存在“裂痕”,也不应夸大这一差异性,并将其作为两位革命导师之间存在对立的证据。从总体上看,马克思恩格斯在此问题上的看法和立场具有根本的一致性。

(一)在论述俄国村社的发展前景时,马克思恩格斯所坚持的立场是一致的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村社问题的看法一直争议不断,其中又以“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是否对早期的观点进行了‘修正’”,争议最大。笔者认为,关于俄国村社是否可以在自身的基础上过渡到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是一致的,即他们都认为俄国村社仅仅依靠自身的特殊性不能实现向更高形式的发展。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以书信的方式围绕东方社会的发展问题交换看法,恩格斯一直反对将俄国村社看作现成的社会主义制度,认为这是一种陈旧且迂腐的观点。虽然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强调应当以不同于西方的观点来看待俄国村社问题,但是在论及其可能的发展前景时,他们却从来都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俄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现实性和实现跨越的可能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是同时存在的。早在1875年《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恩格斯就提出俄国村社向高级形式过渡的可能,虽然不同于马克思跨越理论的相关表述,但是其思想主旨是一致的。事实上,关于这一点不应该存在什么分歧,因为在《共产党宣言》的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有着共同的表述,即俄国革命与欧洲革命若能实现相互配合,就可以使俄国摆脱困局并获得

新生⁶⁸。然而,还是有观点指出马克思倾向于俄国村社过渡到高级形式的可能性,而恩格斯则一直否认这种可能性。对于这一点,从具体的表述来看,似乎二人之间的确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以此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对立”的凭证,则证据不足。事实上,这仍是一种片面摘取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并进行简单对比的做法。如,对马克思“跨越”观点的强调多摘自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在该文中,马克思提出俄国村社由于具备了天然的土地所有制模式和独特的内外部环境,在各种有利条件的加持下,可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信件的内容如果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似乎就证实了马克思是坚定的“跨越论”支持者。但是如果对信件的内容继续加以搜索,就可以发现这样一句话,“从理论上说,俄国的农村公社……可以成为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⁷⁴⁶³既然有“从理论上讲”,那有没有“从实际上讲”呢?当然有,在复信草稿的二稿中,马克思提出,即使不从理论上考察俄国村社的前途命运,那么这一特殊的组织形式也同样面临来自外部的威胁,快速积累的资本主义因素正在日益瓦解村社的内部结构并逐步培养出与农民阶级对立的农村富裕阶层。这样,俄国村社就既要面对沙皇政府的剥削,又要面对来自内部因素的破坏。试问,俄国村社能够在这样的内忧外患中生存下来吗⁷⁴⁷⁴?可见,马克思基于对客观事实的分析,明确表达出他对俄国村社的担忧,这是不能否认的。既然如此,又何来的“马克思只强调俄国村社实现更高形式发展的可能性,而对其趋于解体的可能性缺乏论证”呢?同理,认为“恩格斯晚年完全否认俄国村社存在跨越的可能”这一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尽管恩格斯晚年一直强调俄国的革命进程走得太慢,俄国村社衰败的迹象日益明显。但是,恩格斯仍然对俄国村社实现跨越式发展给出了种种限制性条件。事实上,恩格斯一直都承认东方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以及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反对机械地看待社会发展问题,认为应当以不同于西方的观点来看待俄国的发展。只是他将关注点更多地停留在前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如何根据现有的条件实现向高级所有制形式的发展,这与马克思所阐述的观点是一致的。恩格斯晚年时期一方面对马克思提出的“跨越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另一方面,对俄国民粹派沉迷于农村公社独特性的现象进行批判。在与俄

国社会主义者的通信中恩格斯也多次强调,他始终同意马克思在批驳米海洛夫斯基时所提出的观点,即俄国村社实现更高形式发展的前提条件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西欧经济体制的变革这一外部推动。恩格斯晚年一直强调俄国村社实现更高形式的发展所必须具备的历史前提和现实基础,因此,提出“恩格斯认为俄国在任何条件下都注定要走西方发展道路”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在对待俄国的出路问题时,马克思恩格斯的立场是一致的,即他们都希望俄国能够避免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老路。但是,他们从未无条件地就俄国村社的发展许诺一个美好的未来。此外,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提出的跨越理论与恩格斯晚年提出的俄国可以缩短资本主义行程的观点存在较大的差异,认为“跨越”与“缩短”具有明显不同的含义。这一观点显然无法成立。首先,马克思提出的“跨越”究竟是跨越了什么?笔者认为应当是资本主义的一切灾难性波折,即马克思认为俄国村社在有利条件下可以避免这些波折,从而实现向高级社会形式的发展。而恩格斯所提出的俄国可以缩短行程,其含义也正是俄国可以缩短“临产之前的阵痛”,从而获得新的开始。因此,对此观点的对比不仅无法说明马克思恩格斯的对立,反而证明了二位革命导师观点的一致性。

(二)在回击民粹派的错误观点时所坚持的立场是一致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民粹派的错误观点进行批驳时所存在的态度上的些许差异并不影响他们在回击民粹派时所坚持的立场上的一致性。支持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学者片面摘取两位经典作家对待民粹主义者的不同看法,强调两位革命导师观点上的差异性,提出恩格斯始终对俄国民粹派持否定的态度,而马克思则强调对民粹主义合理观点的吸收和运用。事实上,在前面已经论述过,马克思恩格斯对待民粹派的态度确有所差异,恩格斯的方式较为直接,马克思则相对婉转,这也是事实。但是不能忽略了时代环境和革命形势的影响,因形势的改变和斗争的需要而改变论战策略,这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生涯中也是常见的。如果以此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对立的证据,则是万万不能成立的。马克思对俄国民粹派的态度相比恩格斯而言,显得较为温和,这是无可争辩的。但这并不代表马克思对民粹派的观点是不加

甄别的全盘接受。而恩格斯对民粹派的回击较为直接,也不能代表恩格斯就此否定了民粹派的所有功绩。同理,更不能由此得出他们二人存在对立的观点,这既不符合实际,也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事实上,对于民粹派唯心主义和空想成分的观点,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是激烈反对的。恩格斯晚年对民粹派的诸多错误观点(如民粹派否认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大搞村社崇拜等等)一一进行回击。这样的态度在马克思的相关著作中也多有体现,如马克思强烈反对米海洛夫斯基将他关于西欧社会发展规律的论述强加于俄国,也反对赫尔岑片面强调俄国村社的独特性并将俄国革命的成功看作欧洲旧制度坍塌的唯一前提等等。事实上,恩格斯晚年与特卡乔夫、丹尼尔逊等人的论战正是对马克思早年观点的维护。所不同的是,恩格斯晚年被“强行”拉入了同特卡乔夫等人的论战当中,所提出的诸多观点多是为了回击民粹派的种种错误言论。而19世纪70年代之后马克思虽然也与民粹派多有交锋,但更多的是一种交流活动。民粹派诸多学者对马克思充满崇敬,甚至不需要马克思作出一些结论,他们就能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擅自得出一些书中所没有的观点。

(三)在批驳民粹派的错误观点时所涉及内容的一致性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都反对将资本主义全盘否定的观点,提出在强调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灾难性波折的同时,也要重视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快速提升,并强调俄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基本前提就是要充分吸收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其次,马克思恩格斯都反对将俄国村社制度理想化的观点。在不同的发展时期,面对不同的革命形势,马克思恩格斯从未将俄国村社制度理想化。尽管他们对俄国村社寄予厚望,希望俄国走出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是浓烈的热情始终无法替代理性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俄国村社制度的独特性进行解读的同时,对于俄国村社制度的落后性也始终加以强调。再次,马克思恩格斯一致反对将俄国农民神圣化的观点。两位革命导师对俄国农民的艰难处境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认为长久以来俄国农民与村社和沙皇之间存在着双重的人身依附关系,因此,俄国农民的反抗意识也更为强烈。但是,不能就此将

俄国农民理解为天然的革命者。俄国农民缺乏科学理论指导和彻底的无产阶级化,而这些又是社会主义革命所必备的因素。此外,马克思恩格斯都反对过分夸大劳动组合特殊性的观点。俄国民粹主义者将劳动组合形式标榜为俄国的独有特征,认为这一组织形式具有某种神奇的功能,俄国村社因为拥有此项功能就可以快速进入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极不赞成这样的空想主义观点。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加以辨析,有学者将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劳动组合形式的看法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回信草稿中一直强调他对劳动组合形式的认可,而恩格斯则认为这只是一种简单且普遍的协作形式。这里对恩格斯态度的反映应当是真实的,而对于马克思的态度则只是截取了他的部分论点。在给查苏利奇回信的草稿中,马克思为强调俄国不同于西欧的国情,将关注点放在了俄国村社独特性的论述上。在谈到劳动组合时,马克思提出这种合作形式有利于俄国农民从小块土地的生产模式过渡到大块土地的集体合作模式。但是有两个前提:第一,俄国的经济发展要有向集体主义经济过渡的趋势;第二,俄国需具备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而这两点俄国一样都不具备,所以马克思的这一观点也可以这样理解,即由于俄国不具备使劳动组合形式发挥效用的发展环境,民粹派所标榜的劳动组合优势也就无从谈起了。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劳动组合的看法实质上是相同的。最后,在论述俄国村社的性质时,马克思恩格斯都始终强调俄国村社的二重性特征,并提出这一特征既可以使俄国村社获得新生,也可以使其走向解体,对于其积极性和落后性的论述始终秉持客观、科学的态度,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

三、马克思恩格斯考察俄国村社问题思维方法的一致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俄国村社制度和俄国发展前景的考察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研究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逻辑主线,并确立了以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辩证统一、民族性视角和世界性视角辩证统一的科学思维方式。因此,在研究俄国村社问题的过程中二位革命导师不仅产生的观点是相似和互补的,所运用的方法论更是一致的。

(一)就考察俄国社会形态演进的思维方法而

言,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原理

一方面,在考察俄国的前途命运时,马克思恩格斯充分注意到俄国村社的独特性以及俄国面临的独特的历史环境,并提出俄国在有利因素的加持下,可以少走一些弯路,从而尽快实现与社会主义的接壤。关于这一点,可参见马克思批驳米海洛夫斯基只强调社会形态演进的“常规性”而对俄国的独特性视而不见的观点。另一方面,在考察俄国村社特殊性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始终强调俄国的发展应受到社会普遍规律的制约,不能脱离当前的发展实际去解决高级社会阶段才会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关于这一点,可见恩格斯对以特卡乔夫为代表的民粹派不顾俄国村社日趋解体的事实和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趋势而片面强调俄国独特性观点的批驳。

(二)坚持斗争策略的灵活性与斗争原则的坚定性的辩证统一,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俄国村社的考察过程中,经历了与民粹主义者的诸多论战,最终呈现给世人的除了科学的理论内涵之外,同样重要的一点就是灵活的斗争策略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对俄国村社发展前途的研判颇具理想主义色彩^[9],而恩格斯晚年的论断则更具有现实性。这种观点无疑是不能成立的。无论是马克思生前面对俄国较为火热的革命形势,还是恩格斯晚年面对俄国村社日趋解体的形势,他们对俄国发展前途的研判,始终基于俄国的现实发展状况和所处的世界历史环境。面对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对手以及不同的观点,他们敢于打破常规,作出符合实际的科学论断。这样的品格,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辩证统一。

(三)坚持生产力方面的不可跨越性以及资本主义灾难性后果的可跨越性之间的辩证统一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思想”中,关于哪些方面可以跨越、哪些方面不可以跨越,有着严格的规定性。在考察俄国的发展前景时,他们既注意到了俄国土地占有形式的独特性和俄国所处的历史环境的独特性等社会关系领域优越于西方国家的存在,也看到了俄国村社的封闭性和俄国农民的落后性等社会关系领域落后于西方的存在。因此,他们提出俄国在社会关系领域既有可以超越西方国家的一面,也有无法超越的一面。在社会生产力

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强调充足的物质基础和西方的技术支持在俄国实现跨越过程中的重要性。在对特卡乔夫等人不顾俄国落后的生产现状而追求盲动的唯心主义观点给予有力回击的同时,他们反复强调俄国薄弱的生产力基础和单一的农业发展模式,认为俄国的当务之急是补齐自身的短板。在做好跨越前的物质保障之后,俄国才可以避免经历资本主义的灾难性波折,进入全面发展的阶段^{[9][10]}。

(四)坚持民族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有机统一

在论述俄国的革命前景时,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将研究视角局限于俄国,而是将俄国革命置于世界革命的发展框架中,既强调俄国革命的独特性,又强调俄国革命对推动欧洲革命乃至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或缺性。如果说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回信中强调的是俄国这一特殊的国家应当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那么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恩格斯则是将俄国革命问题上升到世界其他落后国家如何利用自身优势和外部条件有效缩短资本主义行程的问题,实现了从微观叙事到宏观叙事的转变。

参考文献:

- [1] 周凡. 在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对恩格斯与特卡乔夫论战的反思(下)[J]. 学术研究, 2015(6): 1-11.
- [2] 徐亮, 王伟.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上是否对立[J]. 学术研究, 2023(8): 22-28.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4.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5.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 [8] 关锋, 刘卓红. 理论上的可能性和现实中的不可能性——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关于俄国村社问题研究之比较[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4(5): 44-49.

责任编辑: 马俊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历史性考察

——基于《论犹太人问题》的解读

王启立

(南开大学,天津 300350)

[摘要]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封建社会下,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都处在尚未成熟的阶段,存在的只是政治性的市民社会与基督教国家,并且二者是紧密融合在一起的。政治解放使市民社会摆脱了政治的束缚,国家摆脱了宗教的束缚,这时才形成一般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可是,政治解放也导致了二者的绝对分离与对立,社会、个人都处于二元化之中。未来,通过人的解放,真正的共同体将扬弃旧的社会组织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使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个体生活和类生活再次统一起来。

[关键词]市民社会 政治国家 《论犹太人问题》

恩格斯曾经说过,“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1][2]}。这种历史感在形式上最直观的展现是,黑格尔不是像其他哲学家那样将世界视为静止的哲学体系,而是运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将世界理解为一个处在运动、变化之中的精神体系。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进行了批判性的改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唯物辩证法,他没有摒弃黑格尔“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而是为其赋予了深厚的社会历史内涵。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最为著名的三段式出现在其后期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研究对象分别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生产资料所有制,而对于其早期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有关“市民社会与政

治国家”的三段式,学者们一般较少论及。故而,本文力图梳理清楚马克思于《论犹太人问题》中针对这一问题的三段式思路。

一、政治性的市民社会与基督教国家的原初融合

1843年,为反对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马克思写作了《论犹太人问题》一文,并于次年发表在《德法年鉴》上。马克思主要在三个问题上驳斥了鲍威尔的观点,这三个问题按照写作顺序依次为:犹太人能否在不放弃本民族宗教的情况下获得政治解放?犹太人的宗教和人权是否彼此冲突?犹太人究竟应该采取哪种方式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在讨论第二个问题的时候,马克思谈到了政治解放实现之前的旧式社会的历史情况。“旧社会的性质是怎样的呢?可以用一个词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前主要社会思潮的最新发展动态及其批判研究”(立项编号:16ZDA101)。

收稿日期:2023-09-15

作者简介:王启立,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表述:封建主义。”^{[2]186} 具体而言,封建社会下,不仅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没有被严格区分,而且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也没有实现分离。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是相互渗透、彼此交织在一起的,共同构成了政治解放之前的封建社会。根据马克思的论述,这种社会实际上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政治性的市民社会与基督教国家。

(一)封建的市民社会是政治性的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这一概念作为理论术语起源于十七、十八世纪,在斯密、李嘉图和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被用于指称基于分工和市场而形成的交往关系及社会组织,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商品经济关系。通过对西欧历史的深入分析,马克思不仅洞察了资产阶级理论家们所揭示的市民社会的现有内涵,而且也精准把握了市民社会的历史内涵或原初含义。他指出:“旧的市民社会直接具有政治性质,就是说,市民生活的要素……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上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2]186} 一般而言,市民社会的各种要素如私有财产、个体劳动、商品交换等都是同政治领域无关的从属于私人的存在,可是,在封建主义下,政治性不仅是封建国家的本质属性,而且是处于它的统治之下的市民社会的直接特性。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具有封建色彩的市民社会不是斯密、李嘉图和黑格尔所谈论的市民社会,而是旧式或政治性的市民社会。处在这种市民社会中的人,他的经济属性就是他的政治属性,他的私人特性就是他的公共特性,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是几乎重合在一起的,物质因素就是给社会人群划分等级的政治依据。所以可以说,政治性的市民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如帮工、行会师傅等,都可以在自己的经济所得中确认自己在社会中的政治所得。

众所周知,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经济因素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因素,不过,在封建社会中,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经济因素对社会生活所起的决定作用尚未显著地表现出来。取而代之的是,代表政治权力的皇帝、国王、领主等事实上掌管了全部社会生活,如此,政治因素便在各种社会因素中起决定作用。政治性成为封建社会的本质特性,政治力量成为代表封建社会的唯一力量,“市民社会等级与政治等级具有同一性,市民社会实际上就是政治社会”^[3]。

(二)封建国家是基督教国家

在《论犹太人问题》这篇论文里,有关基督教国家的论述出现于马克思与鲍威尔的第一个问题讨论之中,即犹太人能否在不放弃本民族宗教的情况下获得政治解放。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得出了与鲍威尔截然相反的结论。在鲍威尔眼中,犹太人问题是纯粹的宗教问题,如果犹太人想要使自己获得解放,就应该放弃自己的犹太教,因为普遍性的政治解放是以废除宗教为前提的。“只要国家还是基督教国家,犹太人还是犹太人”^{[2]164},就没有任何一方可以获得解放。马克思则认为,如果说犹太人问题是宗教问题,那么,这只是适用于还没有实现政治解放的德国。“在德国,不存在政治国家……犹太人问题就是纯粹的神学问题。”^{[2]168} 可是,在那些已经完成了政治解放的国家,犹太人问题便不再是单纯的宗教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世俗问题。

不同于英法等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德国由于在政治制度上落后于其他先进国家,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国家,而是基督教国家。“所谓基督教国家,就是不完善的国家,而且基督教对它来说是它的不完善性的补充和神圣化。”^{[2]176} 也就是说,基督教国家之所以需要基督教来补充自身,是因为这种国家是还没有实现政治解放的封建国家,而封建国家是无法像现代国家那样实现人在政治领域中的普遍性的。与之相反,在英法等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现代国家,由于已经在政治领域之中实现了人的普遍性,即把每一个人都变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公民,国家便不再需要宗教来补充自身。因此,只有现代国家即民主制国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基督教国家充其量只是一种还没有成为国家的国家。

虽然基督教国家不是真正的国家,但它也无法使自身成为真正的基督教国家。马克思说:“它对自身来说,始终是一个可疑的对象,一个不可靠的、有问题的对象。”^{[2]178} 为什么基督教国家会产生这种自我怀疑呢?原因在于,代表彼岸世界的普遍性的宗教,会同代表此岸世界的特殊性的封建君主发生冲突,这是基督教国家凭借自身力量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基督教国家在把基督教奉为国教的同时,理应把自己视作奥古斯丁所断言的上帝之城的人间化身。在这种情况下,它就需要把宗教在幻象领域所实现的人的普遍性,变

成在现实领域中真正存在的人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基督教国家从其本质而言是前资本主义阶段的落后的封建国家,它事实上维护的是以封建君主为首的土地贵族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它不可能实现人在现实世界中的普遍性,所能实现的只是人的特殊性。因此,基督教国家只能是一个自我分裂的、内在冲突的政治实体,它的宗教目的同它作为国家的世俗目的是彼此矛盾的。马克思认为,“这个国家只有成为天主教会的警士,才能摆脱自己的内在痛苦。”^{[2]178} 这不禁让人联想起十二、十三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在那种情况下,德皇、法王、英王等世俗君主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天主教会的警士”。

综合以上论述,无论是在私人领域还是在公共领域,封建社会都不能真正地实现人的普遍性。尽管封建君主及其附属集团充当了公共领域的代表,但却只具有形式上的普遍性,实质上所代表的还是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始终“表现为一个同人民相脱离的统治者及其仆从的特殊事务”^{[2]187}。而如果使宗教在彼岸世界中所许诺的人的普遍性成为现实,就不能通过所谓的基督教国家这一途径,必须要通过资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即政治解放。

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论

《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与鲍威尔对于如何看待政治解放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由于当时德国的政治制度处在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以鲍威尔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高调鼓吹政治解放的历史作用。在鲍威尔看来,政治解放是以消除人的特殊性为前提的解放,这种解放能够使人在现实社会中获得真正的解放,而对于如何解决犹太人问题,他同样诉诸政治解放。鲍威尔认为,如果犹太人想要使自己从政治上受压迫、受歧视的状态中解放出来,首先应该放弃自己的犹太教,因为政治解放是使人摆脱宗教束缚的真正的解放。马克思并不否认政治解放所具有的重要历史作用,“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2]174}。可是,马克思认为,鲍威尔只是看到了政治解放在人类历史中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而没有发现它所具有的内在局限性。正是由于鲍威尔理论分析的片面性、狭隘性,他在谈论解放问题时实际上把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混淆在一起,将政

治解放误认为人的解放,从而夸大了政治解放所具有的有限意义。

(一)社会境遇、人的生存的二元化

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最突出、最明显的局限性在于它导致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彼此分离甚至对立。通过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治革命,以资产阶级为首的人民群众推翻了封建贵族的统治,用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国家取代了传统的封建国家即基督教国家。由于不需要宗教来充实自身本就具有的普遍性维度,政治国家同宗教这一私人领域的要素实现了脱离,国家真正具有了公共性、普遍性的内涵。在国家同私人领域分离的同时,市民社会也同公共领域实现了分离。马克思认为,“政治革命是市民社会的革命”^{[2]186}。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是市民社会通过革命运动使自己从封建国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清洗掉自身所具有的政治因素。通过这种剥离,政治革命催生了新型的、纯粹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各种要素,“只有当国家宣布它们是非政治的因而让它们自行其是的时候,它们才开始获得充分的存在。”^{[4]317} 因此,政治解放导致的结果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化:一方面形成了只与公共领域事务相关联的政治国家,另一方面形成了已丧失掉任何公共属性、只具有私人属性的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这种分离带来了资本主义下人的生存的二元化,即每个人都生活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双重状态之中。马克思说:“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2]172}“天国”所对应的是政治国家的成员即公民(citoyen),“尘世”所对应的则是市民社会的成员即市民或人(homme)。一方面,在政治国家中,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及其观念被彻底抛弃,自由、平等成为现实,人在政治共同体中有了现实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在市民社会中,尽管人人生而平等得到社会普遍认同,但是各个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却依旧是最直接的、赤裸裸的社会现实。每一个人始终是作为利己的存在物而生存的,都把自己视作最高目的,而把他人看作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可见,政治解放并没有带来真正的解放,人实际上是生活在彼此对立的两种状态之中,在前一种状态下,作为公民的人是社会存在物,在后

一种状态下,作为市民的人是个体存在物。

(二)二元化中的颠倒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在理解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市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时,所持有的是一种颠倒的、错乱的、不合理的态度。既然政治国家体现着人的类本质,是人的普遍性在公共领域的真正完成,那么,它就应该成为市民社会的目的。因为与政治国家所代表的普遍性相比,市民社会所代表的只是特殊性、有限性,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不是具有普遍性的人,而只是具有特殊性的个体。可是,现实历史中所呈现出来的情况却恰好相反,除了在革命的高涨时期如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时期,政治国家曾经短暂地成为目的外,在绝大多数时间,政治国家都沦为市民社会用以实现自身的一种手段。

另一个颠倒性的关系存在于市民与公民之间。作为公民的人所体现的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属性,是人所应该具有的类的普遍性,是人之为人的类本质。所以,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只有成为公民,才能使自身作为真正的人进行行动。与之相反,在私人领域,人是一种依旧处在特殊性之中而并未上升到普遍性的人,所充当的只是一种不真实的人即市民。按照这种区分进行理解,代表普遍领域的公民理所当然代表特殊领域的市民的目的,然而,现实情况正好相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并不把自己的公民身份看作自己的现实存在,而是把不具备普遍性的市民身份视作自己的真实的、本真的存在。在政治国家中,“人是想像的主权中虚构的成员”^{[2]173},只有身处市民社会,人才感觉到自己是活生生的、真实的存在。由此,本应是目的的公民变成了手段,本应是手段的市民却变成了目的。

以上所说的颠倒且不合理的二元关系恰恰暴露了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即政治解放只是而且也只能是在政治领域中赋予人们以普遍性。在马克思看来,政治解放之所以是政治解放,正在于它是对其他社会领域不加触动而只是解放政治领域的解放,所以,它必然对市民社会采取不加批判的态度,并且把它当作对政治国家而言的天然的社会前提。而且,政治国家也只有在同市民社会保持对立的情况下,才能够将自己确认为政治国家。正是由于政治解放对市民社会的非批判性,市民社会才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成为政治国家的目的,市

民才必然比公民更加真实。

政治解放对市民社会的非批判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是人们并没有获得真正的、直接的解放,而只是得到了虚假的、间接的解放,即通过中介实现的解放。马克思说,“国家是人以及人的自由之间的中介者”^{[2]171}。正是在如何看待政治国家所能实现的解放程度上,鲍威尔错误地把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理解为个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与之相反,马克思认为,国家所能实现的只是间接的解放,而不是直接的解放,所以,国家摆脱宗教的束缚并不妨碍个人依旧信仰宗教,国家自由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个人能够获得同样的自由。“摆脱了宗教的政治解放让宗教持续存在,虽然不是享有特权的宗教……就像当时北美的福音派运动。”^[5]由于政治解放无法解决宗教问题,同样也无法解决犹太人问题,马克思认为,“只有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才是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批判”^{[2]167}。

三、真正的共同体是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扬弃

“由于国家是客观精神,所以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6]254}马克思认为,通过政治国家的中介所实现的解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真正的解放是个人无需通过任何中介,只是在自己的感性生活、自己的个人存在中就可以直接实现的解放。这种解放是人的解放,由于个人的自由不再需要经由政治国家的中介,政治国家会丧失自身存在的历史必然性而趋于消失。并且,与政治国家相对立的市民社会也会趋于灭亡,类的普遍性会成为全部社会领域中人的现实属性,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感觉到自己是类存在物。由此可见,人的解放的完成必然意味着社会结构有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政治国家所代表的人的普遍性将完全成为现实,导致政治国家失去了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二是由于全部社会领域中普遍性的实现,市民社会这一特殊性的堡垒被彻底摧毁。

代表人的解放实现的真正的共同体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扬弃自身的结果。“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抗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从此再不会有原来意义的政权了。”^{[7]275}正是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废墟上,真正的共同体这一社会组织得以建立。《论犹太人问题》中,关于真正的共同体或实现人类解放

的社会组织到底是什么样子,马克思并没有详加论述。但是从仅有的阐述来看,我们可以发现真正的共同体是具备以下三个特质的,并且这些特质都同之前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有所关联。

(一)人真正地成为类存在物,一切异化随之消失

鲍威尔高估了政治革命对于人的解放的意义,马克思认为,政治革命只是使个人在政治领域中获得普遍性,在政治领域之外,个人仍旧像从前一样是特殊性的存在。由于政治解放没有使个人真正地摆脱自己的特殊性,具有类的普遍性的人之本身的力量,就只能以一种异化的形式返回,这带来了政治国家的异化以及市民社会中的各种异化现象。

“人在公共领域的自由(即国家的自由),并不等于人在私人领域方面的自由,不等于人的自由。”^[8]¹⁶⁰ 尽管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政治革命使人们在政治领域获得了自由与解放,但这种自由是通过一种特殊性的中介来实现的。马克思认为,“正像基督是中介者”^[2]¹⁷¹,“国家也是中介者”^[2]¹⁷¹,是一种在人之外并同人相对立的异己性存在,由此导致政治国家的异化。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经济领域之中,由于每个人都是特殊的、孤立的原子,把各个原子即特殊个体联系起来的社会中介便成为一种异化存在。这种中介正是人人都渴望得到的金钱或货币,它带来了市民社会中最为根深蒂固的异化现象即货币拜物教。

与政治解放不同,真正的共同体可以使人获得完全的解放。“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2]¹⁸⁹ 但是,只有真正的共同体所代表的人的解放才能够使人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都取得类的普遍性。正是由于普遍性的本质力量复归到了人自身,政治解放所导致的政治国家的异化以及货币拜物教在真正的共同体中都走向了消亡。

(二)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类存在与个体存在的矛盾将得到真正解决

在实现了政治解放的条件下,公共领域同私人领域的矛盾之所以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是因为政治解放只是对政治领域即公共领域进行变革的解放,它把市民社会即私人领域中的各种要素当作无需论证的天然前提。这种无法解决的矛盾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社会处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

家、个人处在市民与公民的双重状态之下,并且,这双重状态之间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颠倒的、错乱的和不合理的关系。真正的共同体恰恰是对这一矛盾的真正解决,在这种共同体中,人们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不再相互隔绝而是彼此交织在一起,真正的共同体的成员将会“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2]¹⁸⁹。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公共领域同私人领域、类属性同个体属性的统一正是对政治解放所导致的二者分离的超越。

(三)宗教由于失去了自身赖以存在的世俗基础而在未来走向消亡

马克思认为,宗教之所以能够在人类历史中长期存在,是由于个人是同其他个人分离开来的、只具有特殊性的人,是还没有获得普遍性的人。具体到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政治解放没有从根本上变革市民社会的特殊性,反而把这种特殊性视作自己的天然前提,宗教也就不可能真正地走向消亡。所以,只有彻底变革市民社会以及其所包含的各种私人要素,使现实的人成为具有普遍性的人,宗教问题才能得到真正解决。这恰恰是人的解放的旨趣所在,这种解放用真正的共同体取代了象征特殊性的市民社会,用作为共同体成员的人取代了作为市民的人。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人不再是彼此分离的原子,而是共同体中的成员,因而便不再需要宗教这一幻象中的普遍性来充当人们的精神慰藉,宗教就此踏上了它的消亡之路。

从以上分析可见,真正的共同体既是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否定,也是在人的解放的条件下对二者所代表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所做的一次崭新探索,这可以称得上是一次扬弃。真正的共同体克服了许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单凭政治解放而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

真正的共同体是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既批判又继承、既克服又保留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这一新型社会组织正是对犹太人问题的真正解答,因为犹太人问题就本质而言不是鲍威尔所声称的宗教问题,而是市民社会中的犹太精神问题。“鲍威尔要通过扬弃宗教而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则要通过废除私有财产达到这一目的”^[9],犹太精神是建立在市民社会的私有财产基础上的货币拜物教或拜金主义,而如果市民社会被一种新型社会组织即真正的共同体所取代,犹太精神自然也

会随之消失。“如果有一种社会组织消除了做生意的前提,从而消除做生意的可能性,那么这种社会组织也就会使犹太人不可能存在。”^{[2]192}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3]艾四林,柯萌.“政治国家”为何不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关于《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与鲍威尔思想分歧再探讨[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5):45-52.
-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

民出版社,2009.

- [5]周阳.市民社会批判、政治批判与宗教批判的统一——重审《论犹太人问题》的内在逻辑[J].兰州大学学报.2021(3):29-36.
- [6][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8]林进平.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研究读本[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 [9]朱学平.从共和主义到社会主义——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新解[J].现代哲学.2014(3):1-13.

责任编辑:徐书琴

(上接第36页)在党内造成了惩办主义,使党的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因此,新时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需要预防惩办主义等错误倾向,要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健全党内政治生活,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此基础上,巩固党的铁的纪律。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3]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 [4]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文献选编:第1卷[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
- [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6]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7]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J].共产党人,1939(1):11-13.

- [8]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9]罗迈.论党内铁的纪律[J].共产党人,1940(4):26-34.
- [10]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11]中央档案馆 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年—1939年)[M].西安新华印刷厂,1994.
- [12]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二:党的建设[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 [13]太岳革命根据地的党的建设[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
- [14]陈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 [15]陈云年谱(1905-1949):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 [16]关于开除刘振球党籍的决定[J].共产党人,1940(4):35.
- [17]拥护开除刘振球的党籍 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J].共产党人,1940(4):36-41.

责任编辑:马俊

《红旗周报》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王淑娜

(山东省委党校,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红旗周报》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委员会编印的第四份机关刊物,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译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阐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大事件的介绍,担负起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任。《红旗周报》选取了灵活多样、贴近实际的传播途径,如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借助纪念活动刊发文章、开设专栏介绍苏区建设、报道国内工人运动情况等。从成效上看,《红旗周报》在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激发民众革命热情、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土地革命时期《红旗周报》马克思主义 传播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尚处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通过党报党刊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扩大马克思主义在群众中的影响。在此背景下,《红旗周报》于1931年3月9日在上海创刊。作为党的机关报,《红旗周报》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宣传媒介。鉴于目前学术界对《红旗周报》的研究成果尚不足,本文以《红旗周报》为研究对象,探讨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内容、途径及成效,以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传播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红旗周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

(一)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

从《红旗周报》的宣传内容上看,一是译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红旗周报》译载经典著作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直接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红旗周报》第6期直接译介了列宁在1905年7月撰写的《革命军队与革命政府》一文,强调了组织革命军队和建立革命政府在夺取政权中的重要作用^①。直接译介的文章还有《国际女工纪念日》《列宁论干部问题——“新的任务与新的

力量”》《关于反对资产阶级报纸的决议草案》《论布尔塞维主义史中的几个问题》等,从而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直接呈现给广大民众。第二种是间接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文本内容,如第39期《为马克思主义而斗争》一文,作者慧素引用了列宁的“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没有革命的行动,便没有革命的理论”^②,以此来抨击一切反革命的欺骗。在《自由的刊物》一文中阐述了列宁的党报思想,在其他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倡导群众斗争的文章中也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文本内容进行了推介,从而加深了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观点的认识。

二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平功绩进行宣传。《红旗周报》专门推出纪念刊号《为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告民众书》和《中央关于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的决议》,将马克思主义看作马克思一生全部观点的集中体现以及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鲜明思想旗帜。在第27期《纪念列宁》中指出列宁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先在一个国家里面胜利”的问题^③,明确了列宁主义对革

收稿日期:2023-09-21

作者简介:王淑娜,中共山东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

命的马克思主义作出的突出贡献,进一步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历史功绩。

(二) 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阐释。《红旗周报》出版共64期所刊载的文章中,标题含“群众”二字的文章有18篇,充分表明群众史观是《红旗周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从第1期《击破国民党进攻红军的新计划》中明确党应当接近、夺取和组织群众^[4]到第59期《再论巩固党的组织的迫切任务》中指出巩固党的组织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加强群众工作^[5],再到第63期《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中阐述的“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工作方式”是最大的敌人^[6],可以看出《红旗周报》始终关注人民群众,宣传工农群众在革命事业中的巨大作用,既突出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又明确了党对于群众工作的组织领导方式,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传播。

二是对阶级斗争思想的阐释。《红旗周报》刊载了大量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文章或报道,号召广大军民群众运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反抗国民党的黑暗统治。瞿秋白在《红旗周报》第33期发表了《国民党还配谈领导权吗?》,全面揭发了国民党和反革命派的丑恶行径,指出必须由无产阶级带领广大人民推翻国民党政权,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7]。黄卷在《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指明了在革命中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提出同一切机会主义和反革命派作斗争、扩大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土地革命与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等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具体任务^[8]。充分说明了《红旗周报》顺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号召通过阶级斗争清除阻碍人民自由的敌人,有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思想。

三是对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阐释。《红旗周报》对党的理论的阐述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关于党的干部问题的阐述。如《党的干部问题》《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论训练干部问题》等文,分析了干部恐慌现象形成的内外因素以及党在历史上的错误表现,如“不懂得干部是什么”“始终留恋旧干部”“党内家长制度与委派主义妨碍”等,并提出了“在组织上巩固党的全部工作”的具体方法^[9]。后又进一步指明了训练马克思主义干部的重要意义以及训练干部的理论结合实际的方法^[10]。其二,对党的作风建设提出要求。如罗平的《论自

我批评》指出党内同志的工作还没有充分利用自我批评的武器,明确了“健全的、积极的、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是巩固和发展党的一个重要武器^[11]。其三,阐明党的组织建设任务。如《再论党的组织的迫切任务》中提出了加强群众工作、扩大和巩固党领导的积极干部、加强党的无产阶级成分等具体任务^[12]。《红旗周报》对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传播,使广大工农群众更好地接受党组织的领导。

四是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阐释。《红旗周报》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刊登了不少有关妇女工作的文章。如第58期特别刊载了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文章,包括《中央关于“三八”妇女节的决定》和《国际女工纪念日》,文中明确了妇女工作和妇女运动的重要意义,提出了“非吸引妇女去参加政治,便不能吸引群众参加政治”^[13]等观点。第18期的《论下层的统一战线》、第25期的《鄂豫皖苏区的巩固与发展》、第27期的《怎样去扩大上海反帝的罢工运动?》、第31期的《湘赣苏区省委报告》等文章中也都论述到了妇女问题。可见,《红旗周报》对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传播给予了高度关注,致力于提升妇女的社会地位,让更多民众认识到妇女在革命中的积极作用。

(三) 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大事件

《红旗周报》通过对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大事件的回溯,进一步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巴黎公社六十二周年,《红旗周报》刊登了系列文章《为巴黎公社六十二周年和北京惨案七周年纪念宣言》《巴黎公社六十二周年纪念》《关于巴黎公社六十二周年和北京“三一八”惨案七周年纪念的决定》,聚焦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和历史意义,指出巴黎公社具有伟大的历史功绩,“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写了工人运动史最光荣的一页”^[14];分析了巴黎公社失败的多种原因,包括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与白色恐怖、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不够、缺乏充分的反抗决心、没有没收银行等。巴黎公社留下的深刻警醒在于: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夺取革命的最终胜利,实现巴黎公社的未竟之业^[15]。在当时内忧外患的背景下,这些经验教训的揭示,有助于增加苏区民众对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认同感,激发广大民众的革命积极性。

十月革命的胜利将中国民众的目光引向苏俄,《红旗周报》发表了诸多真实反映俄国十月革

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文章。如《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纪念》重点对比了社会主义建设迅猛推进的苏联和深陷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国家、苏区和白区两个政权下的工农生活。《在突飞猛进中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苏联工人阶级的创造及其生活》等文章,详细报道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非凡成就,让更多群众坚信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此外,《红旗周报》还对苏俄以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给予了关注,如第29期报道了日本无产阶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号召日本的工农大众“应该拥护中国工农与他们的苏维埃以及红军”,日本的无产阶级“应该和中国苏维埃与国际无产阶级共同奋斗。”^[19]另外,《捷克斯拉夫的红色纪念日》《印度民众革命的发展》等文章报道了捷克斯拉夫、印度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情况,展现出世界无产阶级的顽强抗争精神。

二、《红旗周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途径

(一)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纷繁复杂的局势,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打着“救国救民”旗号却言行不一致的非马克思主义派别,如以邓演达为代表的第三党、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托陈取消派、第二国际以及改组派、右派小组织、国家主义派等,为了降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干扰,《红旗周报》以犀利的语言文字对这些阻碍中国革命发展的主义、派别进行了抨击,刊登了《第三党是什么东西?》《第三党是国民党的忠实拥护者》等文章对第三党的虚伪性进行了揭露,先后发表《且看取消派向谁进攻》《取消派的“工人运动”》《满洲事变中的取消派》等对托陈取消派的主张进行了严厉抨击。为了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国际展开斗争,先后刊登《第二国际是战争的组织者》《第二国际反对战争的滑稽剧》等文章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总之,《红旗周报》通过与非马克思主义派别的理论交锋,降低了非马克思主义在群众中的负面影响。

(二)借助纪念活动刊发文章

借助纪念活动刊发文章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以纪念活动为载体,通过对纪念活动的报道和评论,能够加深人民对马克思主义及党的领导的认同。《红旗周报》刊载了许多有关纪念活动的文章,如第50期《九一八的一周年纪念》谈到“一年来的经验,已经教训了广大的工农劳动群众,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统治,是只会投降日

本及一切帝国主义,是只会出卖民族利益,是只会镇压与屠杀反日反帝斗争民众,是只会引导帝国主义之更凶暴的进攻”^[17]。在《为五卅纪念宣言》中呼吁全中国的工人阶级必须发扬五卅精神,为打倒国内外反动派而斗争^[18]。此外,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三八妇女节也是《红旗周报》的重要纪念对象。《红旗周报》围绕这些不同的纪念活动刊登大量文章,揭露了资产阶级的黑暗统治,调动了工农群众参与革命的积极性,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基础。

(三)开设专栏介绍苏区建设

《红旗周报》开辟了两个特色栏目:一个是“蓬蓬勃勃的中国苏维埃运动”。该栏目专门介绍地方苏区的建设情况和最近动态,如第25期详细介绍了鄂豫皖苏区的赤区发展、土地分配、财政经济、肃反工作情况等,对其他苏区的介绍内容也涵盖了土地问题、财政状况、群众斗争、文化建设等各个方面,这一形式促进了生活在白区甚至国外的民众对苏区的了解,与国统区的黑暗统治形成鲜明对比。另一个是“苏区通讯”。《红旗周报》刊载的文章结尾经常出现“通信”“通讯”字样,并且这些通信和通讯多以国家或地区命名,文章内容也大多与之相关,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工农通讯社”。这些通讯社的工农通讯员通常来自人民群众,具有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他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苏区生活和建设状况进行描述,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

(四)报道国内工人运动情况

《红旗周报》是对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实记录,其中刊登了39篇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章,不仅报道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工人罢工经过,而且通过这些文章对工人如何进行罢工、如何建立统一战线、如何反对黄色工会等方面工作进行了指导。如《河北最近工人斗争的形势与我们的紧急任务》中描述了“八千多矿工两次包围公安局,工人自动捆绑并驱逐黄色领袖,与保安队实行武装斗争”的罢工场景^[19];《怎样扩大上海反帝的罢工运动》中谈到必须同“工人运动与反帝运动分离、经济斗争与反帝罢工对立”的现象作坚决的斗争^[20]。在这一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的实践相结合,在指导工人运动中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三、《红旗周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成效

(一)普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红旗周报》作为一份报纸,在向民众传递新闻、信息的过程中普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极大地提高了民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接受度。《红旗周报》中的一段描述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学校里俱乐部中都高挂列宁和马克思的像片,农民家中许多从前本是供奉菩萨的,现在都是被马克思列宁驱逐出去了”,“一切菩萨的神宇,都变作列宁学校了。”青年群众都高喊着“打倒菩萨”“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21]。这一时期的苏区,在党报党刊的舆论影响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民众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民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同程度日益提高。

(二)激发了民众的革命热情

《红旗周报》通过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猛烈抨击,激发了民众的革命热情,对于推动革命发展、打击反动势力起到了积极作用。一方面,在《红旗周报》的影响下,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都积极投入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队伍之中,尤其是东北的学生群体,义无反顾地进行游行示威、写标语、撒传单等活动。另一方面,《红旗周报》向工农群众揭露了国民党的真实面目,增强了民众对于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信心,引导民众团结在中华苏维埃的旗帜下,凝聚了强大的革命力量。在这一时期,妻子鼓动丈夫、母亲劝说儿子参加红军的事例数不胜数,极大地加强了红军的作战力量。

(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红旗周报》作为党的喉舌,始终坚持党的立场,汇聚、培养了一支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宣传队伍。这支队伍中的很多人,不仅具有广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而且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中国的发展。同时,《红旗周报》每期都会刊登党的纲领和决议,内容涵盖了统一战线、土地政策、群众工作等基本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红旗周报》传播马克思主义效果。但无论如何,《红旗周报》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利用党报党刊进行理论宣传的策略和智慧,启示我们在新形势下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不断创新话语体系,运用媒体优势推进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 [1] 革命军队与革命政府 [N]. 红旗周报, 1931-04-18.
- [2] 慧素. 为马克思主义而斗争 [N]. 红旗周报, 1932-05-02.
- [3] 何史文. 纪念列宁 [N]. 红旗周报, 1931-12-17.
- [4] 吴真. 击破国民党进攻红军的新计划 [N]. 红旗周报, 1931-03-09.
- [5] 陈文. 再论巩固党的组织的迫切任务 [N]. 红旗周报, 1933-08-31.
- [6] 毛泽东. 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 [N]. 红旗周报, 1934-01-01.
- [7] 瞿秋白. 国民党还配谈领导权吗? [N]. 红旗周报, 1932-03-25.
- [8] 黄卷. 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 [N]. 红旗周报, 1932-05-30.
- [9] 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 [N]. 红旗周报, 1931-10-13.
- [10] 卡甘诺维奇. 论训练干部问题 [N]. 红旗周报, 1933-08-31.
- [11] 罗平. 论自我批评 [N]. 红旗周报, 1931-09-07.
- [12] 陈文. 再论党的组织的迫切任务 [N]. 红旗周报, 1933-08-31.
- [13] 列宁. 国际女工纪念日 [N]. 红旗周报, 1933-03-08.
- [14] 为巴黎公社六十二周年和北京惨案七周年纪念宣言 [N]. 红旗周报, 1933-03-08.
- [15] 巴黎公社六十二周年纪念 [N]. 红旗周报, 1933-03-08.
- [16] 片山潜. 日本无产阶级反对日帝国主义 [N]. 红旗周报, 1932-09-01.
- [17] 九一八的一周年纪念 [N]. 红旗周报, 1932-09-10.
- [18] 为五卅纪念宣言 [N]. 红旗周报, 1932-05-30.
- [19] 石帆. 河北最近工人斗争的形势与我们的紧急任务 [N]. 红旗周报, 1932-09-10.
- [20] 怎样扩大上海反帝的罢工运动? [N]. 红旗周报, 1931-12-17.
- [21] 鄂豫皖边苏区的实况 [N]. 红旗周报, 1931-04-06.

责任编辑:马俊

“发现合肥”等六则

发现合肥

他们发现了合肥——

国家航天局将深空探测实验室总部设在这里；12个大科学装置布局这里；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将本土外全球首个研发中心落户这里；50家世界500强企业奔赴这里；超3000亿元规模基金丛林诞生于这里……

合肥发现了他们——

从中科大到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从量子、“人造太阳”到深空探测，从京东方、长鑫存储、科大讯飞到大众、蔚来、比亚迪，发现一个便成就一个，进而汇聚一群，接着建构生态。

是“最牛风投”还是“最大政府投资公司”？是“黑马”还是“赌城”？外界热衷于给合肥贴上这些标签，无非是捕获到前面这些发现，或是透视了数据里的合肥：近十年经济总量从4000亿元跃升至1万亿元，增幅位列全国万亿城市之首；以平均每年前进一位的速度，跑进全国城市21强。

何以合肥？我们一直在发现。

发现，讲求格局

这是1952年刚被确定为省会的合肥：5条路、5万人、5家企业、5平方公里。那时根本想不到，多年之后，“到月球去”会和这座城市产生联系。

走进合肥西郊，深空探测实验室总部落户已一年多，这里将建成为我国深空探测领域重大科技工程的综合支撑平台，培育月球科研站等国际大科学计划。不远处，聚焦深空互联网、深空遥感、深空资源利用的空天信息产业园初具规模，1.3平方公里的深空科学城即将开建。

当有机构预测2025年我国空天信息产业将达万亿元规模，合肥“十四五”规划已经布局“逐梦星空”新赛道。

有人说，合肥又在“赌”明天。合肥说，我们只

是在发现未来。

发现，讲求格局。

每每谈到合肥今天的经济格局，亲历者总要提到最关键的三次“发现”。回溯这三次产业发现，我们发现的，就是合肥发现的格局——国之大者。

聚焦“国之大者”抓痛点、难点、敏感点，以敏锐的产业眼光发现潜在的行业机会，以务实的国有资本投资未来的企业龙头，以专业的管理团队防范风险。

正是胸怀天下的格局，成就了今天“芯屏汽合”的合肥。

合肥人津津乐道于2008年与京东方的第一次牵手，它是合肥产业投资发现的开山之作。

十多年前，家电已是合肥第一个千亿产业，但合肥看到的却是行业痛点“少屏且贵”。

那时，我国电视机产量约占全球一半，但占生产成本70%的液晶显示器件自给率不足10%。

那时，北京企业京东方四处寻找新产线落地却屡屡碰壁。合肥市决策层力排众议，拍板与京东方共同投资175亿元在合肥建设国内首条液晶面板6代线。那一年，合肥财政收入仅有160亿元。

当年充满争议的产业投资，打开了此后合肥产业投资的想象路径。发现痛点打通过程，不仅成就了京东方，而且使我国大尺寸液晶显示屏摆脱了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也成就了今天合肥以“屏”为代表的第二个千亿级产业。

心怀国之大者，要看准国之重器，合肥就义无反顾。

2016年，继“屏”之后，合肥又从“缺芯”之痛中发现并投资长鑫存储，使我国掌握了内存芯片的自主产能，培育了下一个合肥地标产业“芯”。合肥集成电路产业与新型显示产业一道入选首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2020年，瞄准以新能源汽车实现中国汽车产

业“换道超车”的方向,合肥再次果断接纳、投资已在 18 个内地城市寻求落地未果、面临美股退市风险的蔚来。合肥市建投集团向蔚来战略增资,半年后退出部分股权,并获得了让人惊羨的收益。

今年 1 月至 5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生产形势喜人,产销分别完成 300.5 万辆、29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45.1%、46.8%。

而拥有大众、蔚来、比亚迪、江淮等六家新能源汽车整车企业的合肥,今年底新能源汽车产量力争达 80 万辆,电池产能达到 70GWh,实现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规模约两千亿元。

政府之手和市场之手双向发力,助推合肥“新能源汽车之都”的新目标。大众汽车集团管理董事柯利安说:“合肥对产业的感知力和执行力极强,百闻不如一见。”

近 10 年来,合肥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年均增长超过 18%,占规模以上工业的半壁江山。

把握国家政策导向和产业需求,以国有资本运作,发现一个“潜质”企业就能成就一个,再成就一群,最终以政府无形的手和市场有形的手共同构建起一个强大的产业生态——这就是合肥模式。

格局,不只体现在产业上。合肥目前布局建设大科学装置 12 个,数量之多居全国前列。无论是土地还是资金等要素保障,合肥不遗余力。

合肥说,我们是讲格局的。

发现,展示胸怀

落地合肥 15 年,京东方历经合肥四届党政班子。

蔚来项目落地谈判进行中,经历合肥市主要领导的调整。蔚来汽车创始人李斌说:“合肥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口碑,我不用担心领导调整对企业有什么负面影响。”

产业周期和领导任期,有时难以完全匹配。人走茶凉,领导一变产业就散?

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合肥说,前人栽树,后人浇水。

发现,展示胸怀。

每每谈到合肥今天的生态,局中人总要说到栽树—浇水—施肥—收获的循环,以及眼下若干实例。复盘实例,我们发现的,就是合肥发现的胸怀——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不理旧事另起炉灶,而是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在接续中传

承,在发展中创新,久久为功。

正是如此胸怀,成就了今天持续向前的合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是对政绩观的考量。”受访者一语中的。

合肥市委常委袁飞说,从新型显示、集成电路产业,再到新能源汽车产业,历经多任书记市长,如果每届班子关心支持少一点,这些产业都不可能长成今天的集群。

15 年间,京东方在合肥陆续投资了 6 代线、8.5 代线、10.5 代线三代产线,投资金额约 1000 亿元。在京东方带动下,上下游近百家企业汇聚合肥,形成了合肥目前从“沙子到整机”完整的新型显示产业链条。

不到 3 年,蔚来陆续增资产业链企业并建设研发中心,已经建成运营的新桥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园,将打造为包含芯片、功率半导体、电机、电池、常规汽车零部件、整车制造、用户服务等在内的全产业链聚集区。

“选择合肥,就是冲着合肥良好的契约精神和政治生态。”曾经外出发展、如今回肥创业的合肥艾创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潘俊说,作为合肥青年商会执行会长,他接触了大量外来企业家,大家共同的期盼就是政府对企业要多浇水、少摇晃。“合肥的长期主义给了企业家信心和预期!”

合肥的逆袭有很多变量,但常量就是政府治理能力。

政府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共识。

以政府职能求变应对经济业态多变,这是合肥服务市场的胸怀。机构动态调整顺着形势改、围着产业转,合肥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新设市场拓展指导处,市商务局新设楼宇经济处,市科技局开展科创队伍能力提升行动,组建科创集团、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招商专班,推动形成“大科技”格局,促进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

近 10 年来,合肥累计推出 1200 多项改革举措,其中近 3 年推出 320 多项。

服务就是最好的管理;不是最好的,就学最好的。这是合肥营商的胸怀。2022 年,全国工商联发布的年度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调查中,合肥位列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城市第 10 位。

新兴产业、龙头企业、基金风投纷至沓来。2022 年,合肥新增经营主体 30 万户。

合肥说,成就需要拿出胸怀。

发现,需要眼界

2023年初,电影《流浪地球2》火了。喷出冲天蓝光的行星发动机、洞悉一切的量子计算机、高耸入云的太空电梯……看似科幻的“硬科技”,在合肥都有现实科研的踪影。

爱科学,是这座城市的价值观,也是最鲜明的气质。

有人说,搞科技,见效慢,我们等不及。合肥说,抓科创,起点高,我们有耐心。

发现,需要眼界。

每每谈到合肥的城市气质,所有人都认同“科里科气”。感受合肥无处不在的科里科气,我们发现的,就是合肥发现的眼界——创新无止境。

1969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按要求离京外迁。几地辗转之间,是合肥留出粮票、快速腾出地方,拥抱了中科大。

2022年,“科大硅谷”正式挂牌,承担着汇聚世界创新力量,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集聚地示范工程的愿景。

不能不佩服当年安徽和合肥在自己也饿肚子的情况下承接中科大的眼界。再看今天合肥打造“最美科学岛”、辟出近20平方公里建设“未来大科学城”,就能理解,这就是合肥科里科气的前世今生。

2017年,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设立,与上海张江“两心同创”。

紧盯“四个面向”,只要国家“有所需”,合肥一定“尽所能”;只要认为“值得”,投入一定“舍得”。

近10年,合肥财政的科技投入超千亿元。2022年,合肥市科技投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18%,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当年全市技术合同交易总额首次突破1000亿元。

近两年,全国十大科技突破近三分之一诞生在合肥。合肥原始创新“三大件”——量子科技、核聚变、深空探测不断取得新突破。越来越有科技自信的合肥,眼界就是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担纲承梁。

今天的合肥,无论在科大硅谷还是在“科创驿站”,无论在量子大街还是在中安创谷,当看到一群群年轻的身影鱼贯而入,你就感觉连空气里都弥漫着创新的味道,你就体会到合肥的活力、合肥的自信来自哪里。

发现,有时要靠创造。

有想法有技术,就是找不到用武之地;有需求有项目,就是不知道产品在哪里。合肥对创业者和市场最友好的一个细节,就在于他是一个负责任的好“媒婆”,先以眼力发现一批“俊男靓女”,再组织若干路演“鹊桥会”,促成创业者与市场相互间的“一见钟情”“恋爱结合”。

去年起,在土地、资金、人才之外,合肥将“应用场景”纳入创新要素保障,通过常态化组织技术、产品、场景共同参与的路演,为技术找场景、为场景找产品。

看不见的地下管网潜藏着城市安全风险,换个角度又是智慧城市的场景应用。2015年,合肥启动建设“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开放城市管网等基础设施应用场景。清华大学与合肥两相发现,结合而成“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

如今,在合肥的路面、桥梁、地下管网铺设下8万多套传感设备,实现24小时监测“城市心跳”、精准预警。这套城市生命线系统去年起已在全国推广。

调查显示,在中国内地城市“专利密度”“企业家密度”排行中,合肥分列第11位、第12位。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大科学时代,创新作为一个系统工程的特点越来越强。

在重点产业设立科技工作专班;推进科技招商培育未来产业;成立科创委、战新委、科技成果转化专班;安排一名市委常委统管、专管科技、产业、金融……

合肥以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创新,以产业创新引领科技创新,为促进这两个创新融合,持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合肥说,眼界的高度决定天地的宽度。

发现,蕴含一种温度

合肥中轴线上,占地12.7平方公里、由老机场改建而成的一座新公园即将面世,这将是全球最大的城市中央公园。

曾经,在合肥大蜀山脚下,5000多亩的商业用地被调整为生态绿地。按平均200万元/亩算,至少少了100多亿元的收入。但大蜀山脚下,来登山、晨跑、夜跑的市民越来越多。

有人说:算一算财政账,值得吗?合肥说,提升幸福感,不算眼前账。

发现,蕴含温度。

每每评述合肥的温度,大家举例最多的不是疫情防控就是为企纾困的故事。合肥总是努力发

现城市较冷处并竭力改进传递暖意。细节情景之间,我们发现的,就是合肥发现的温度——来的都是客,返的是家人。

关照更多家人和客人,在疾驰的发展步伐中,这座城市蕴藏着“枝叶总关情”的初心。

正是散发着温度的亲和,造就了频频出圈的合肥。

发现群众“难过”处不放过。破解“出行难”,路边临时泊位延长免费停车时间,打通拥堵点和断头路,内外环快速路网畅通提速;破解“上学难”,加快优质学校集团化办学,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好上学、上好学;破解“就医难”,加快实施名医、名科、名院工程,让老百姓不出远门就能看良医、治好病。

归属感,来自合肥甘当“店小二”用心服务。从谈判到签约用时 23 天,从签约到开工用时 42 天,280 天建成 280 万平方米,不到 10 个月整车下线、5 个月产值过百亿元……比亚迪合肥基地的“合肥速度”,让比亚迪有归属感。

类脑智能是国家面向下一代人工智能的前瞻布局。2017 年,由中科大承建的类脑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在合肥挂牌。众多一流高校参与角逐,唯有中科大获得地方政府按 1:2 配资建设实验室的承诺。

参与实验室申请的刘海峰坦言,合肥让我们有归属感。

刘海峰说的归属感,不仅体现在产业的判断力,也体现在对科学家、创业者的关怀上。正值实验室工作的忙碌时刻,刘海峰母亲需要住院手术。一对一服务引进人才刘海峰的合肥市高新区,派出专门的陪护人员去医院照顾他的母亲。

“这是流淌到心底的温暖。”

发现产业举重若轻,招引人才用心用情。

这个毕业季,合肥“豪爽”推出“合肥请您来,20 万个岗位供您选”,两场对接会吸引 1.7 万名毕业生到场应聘,收到简历 2.4 万余份,达成就业意向 7509 人;推出“博士就业创业在合肥”,500 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博士前来;每月安排全国独角兽企业走进合肥活动。

我们发现,一大批人在用脚投票。2022 年,合肥新增就业大学生超过 30 万人,新增外商投资企业 140 家,常住人口比上年增长 16.9 万,成为人口净流入城市,迈入特大城市。

合肥说,和发达城市比实力、比城建、比文化,

我们发现了差距。但只要发现,就愿意改变。

发现未来,合肥在路上。

(作者:刘菁、杨玉华、吴慧珺、胡锐;来源:《瞭望》2023 年第 26 期)

三问安徽

当下的安徽,话题感很强。

“逆袭”“硬核”“新能源汽车大省”“制造业 top10”……一系列新标签,不断刷新着安徽的产业新形象。

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安徽、好奇安徽、发问安徽,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问:

安徽为何“画风突变”?

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何能异军突起?

安徽发展新兴产业的手法为何越来越“潮”?

一问:安徽为何“画风突变”?

519.2 亿总人次!

这是自开播以来,截至 2023 年 8 月,“精品安徽 皖美制造”在央视平台上的总浏览人次,预估占电视收看总人口的 81.8%。

为什么吸引人?很多观众的言语,为寻找答案提供了生动注脚:

“没想到安徽拥有这么多的制造‘绝活’!”“安徽在新兴产业上的超前布局,让人嗅到了未来的气息。”“直观的视觉体验,满屏溢出的高级感,让人很震撼,安徽制造业‘硬核’表现,颠覆了我的印象。”

安徽的“画风突变”,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今天的安徽,究竟有多“硬核”?

全球 10% 的笔记本电脑、20% 的液晶显示屏、50% 的光伏玻璃在安徽生产。

全国每 3 台冰箱、4 台洗衣机、5 台空调就有 1 台是安徽制造。

全国 20% 的光伏组件、15% 的家电、10% 的新能源汽车是“安徽造”。

光伏领域全球出货量排名前十的企业中,有 7 家玻璃企业、4 家电池片企业、5 家组件企业和 2 家逆变器企业在安徽布局发展。

……

这些现象级产业地标,成为安徽建设智能绿色制造强省的新名片,共同构筑起安徽作为一个

新兴工业大省的产业形象，推动了先进制造业的起势，以致于有了一个专有名词：先进制造业集聚的“安徽现象”。

外界还有评论说，安徽越来越像一个经济大省的样子，在抢占新兴产业制高点中“唱起主角”。在以前，这些都是沿海经济先发省市在做的事。

安徽为什么能“唱主角”？

概括起来说，安徽抢抓多重国家战略叠加催生的新机遇，特别是借上了长三角的“东风”，搭上了一体化的“快车”，发挥区位优势、人力资源等优势叠加的乘数效应，选准产业新赛道，以“领军企业—重大项目—产业链条—产业集群”为发展路径，形成了快速增长的体量、高新产业的引领、科技创新的底蕴的鲜明特色，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大省向新兴产业聚集地的“逆袭”，改变了安徽产业形象。

说起安徽产业形象的改变，就不得不提新能源汽车，不仅仅因为是安徽的首位产业，更因为它已成为安徽最受外界关注的新标签之一。

二问：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何能异军突起？

前不久，汽车界发生了一件大事。

德国大众汽车集团投资7亿美元入股中国造车新势力小鹏汽车。消息一出，小鹏股价直接起飞。

不过，很快却有人说，这次安徽合肥又“赢麻了”。

仔细一看发现，大众执行这一开发任务的实体公司，正是大众汽车(中国)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大众科技”)，总部位于合肥，这是大众汽车集团除德国沃尔夫斯堡外最大的研发基地。

不仅如此，大众中国排在前3位的对外投资主体，全都在安徽，分别为国轩高科、大众安徽、大众科技。

很多媒体评论：“安徽，真是让人刮目相看。”

在中国汽车产业新版图上，谁是这几年发展势头最好的省份？

一家证券机构在一份研报里给出了专业性答案：“安徽省成为近五年中国汽车制造业的黑马。”还有一家证券公司专门写了一篇名为《安徽，世界汽车“硅谷”》的调研报告。

背后的原因，正是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异军突起。

数据显示，安徽汽车产量从2018年的82.4万辆提升至2022年的174.7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

产量从15.8万辆提升至52.7万辆、年均增长52.5%。

2023年1-7月，安徽省汽车产量123.5万辆，居全国第2位，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43.2万辆，居全国第4位，全国每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1辆来自安徽制造。

坦白说，在新能源汽车这条赛道上，安徽并不是“天赋型选手”：既不像广东、上海等拥有先天优势，也不如北京、江苏等具备雄厚经济实力。

安徽之所以近年风头强劲，除了以奇瑞、江淮为代表的本土整车品牌和国轩等动力电池企业发力之外，很大程度上源于蔚来、比亚迪、大众安徽等“链主式”整车龙头企业落户，以产业集聚之力，在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版图上，抢下了一席之地。

更重要的是，一家头部整车企业的引进，身后摆动着巨大的上下游产业链条：

大众在安徽落地后，已有近300家生产供应商和约800家采购供应商就位；比亚迪落户合肥长丰后，全国各地汽车领域客商慕名而来，仅2022年就有约350亿元的产业链项目签约落地。

龙头企业的集聚效应，让安徽成为吸引汽车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投资布局的热土。

策叔注意到，在安徽省发改委的一张全省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全景图上，密密麻麻地标注了新能源汽车的关键厂商，其中已有100多家落户安徽。

目前，安徽已拥有奇瑞、蔚来、大众、比亚迪、江淮、长安、汉马科技7家整车企业和1200家配套企业，建立了全产业链体系，形成了新能源汽车集聚发展的“安徽现象”。

但安徽的雄心还远不如此。安徽深知，汽车市场的调整、产业的变革，恰恰为像安徽这样后发赶超型省份提供了换道超车、后来居上的机遇。

因此，在抢占新能源汽车这条新赛道上，安徽必须当仁不让、一马当先，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建设新能源汽车强省。

新的目标，就要有新的战略、战术与战法，安徽正在全面发力。

战略上，提升新能源汽车为首位产业，明确目标、任务和路径。

战术上，做好整车、零部件、后市场“三位一体”文章，合肥打造新能源汽车之都和智能新能源汽车创新高地，芜湖建设自主品牌集聚区，其他城市各展所长，纷纷入“链”，完善“整车—核心零部

件—产业链—产业集群”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战法上,培育打造创新、智造、服务、人才、文化、资本、开放的汽车产业新经济生态。

很多人说:“安徽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氛围感,已经拉满!”这就是首位产业下的首位打法;更精准、更有力、更高效,越来越“潮”。

三问:安徽发展产业的手法为何越来越“潮”?

前不久,英国《经济学人》刊发了长篇评论文章,深入分析安徽合肥的发展路径,称“合肥模式”赋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其他城市发展提供实践范例,并将“链长制”列为“合肥模式”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实际上,不止是在合肥,安徽早已在全国率先建立由省级领导担任“链长”的产业链链长制。

2021年以来,安徽围绕一个产业链建立一个工作专班,十大新兴产业分别由省“四套班子”领导牵头一个产业,省领导成为“链长”,顶格倾听、顶格协调、顶格推进,逐一编织产业链图谱,统筹固链、强链、延链、补链的各项工作。

从企业家的角度来看,有“链长”跟没“链长”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有问题可以直接找“链长”!

除“链长”外,在每一条产业链中,还有着一种特殊的角色——“链主”。

谁来干“链主”?就是每条产业链中的“带头大哥”。

智能语音有刘庆峰;光伏有曹仁贤;新型显示有张德强……每一位都是各自领域里的头面人物。

他们在行业里最具影响力,最清楚产业链图谱,最清楚产业的上下游企业分布在哪里,让他们在“双招双引”中撮合上下游,显然更有效率。比如,比亚迪之所以落户合肥,就有着“链主”李斌的一份功劳。

同样是“链主”,刘庆峰不仅忙着招引智能语音产业上下游企业,还在忙另一件大事——搭建羚羊工业互联网平台。

这并不是传统工业的一个新工具,而是一张链接和整合工业生产过程所有要素的网络和系统。一句话概括:人、数、器链接起来,流动贯通。

也正是基于此,安徽大力度实施工业互联网三年行动计划和专项支持政策,打造工业互联网高地,累计创建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双跨”平台3个、居全国第5位,打造世界级“灯塔工厂”4个、居全国第3位,推动“安徽制造”向“安徽智造”转

变。

用平台思维做发展乘法,背后的实质是“有为政府让有效市场更有效”,这也体现在安徽运用资本力量上,备受外界关注。

“你们是怎么做到资本‘以投带引’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当越来越多的城市问计安徽时,安徽却已开始做母基金、招引子基金,建立“一个庞大的资本灌溉团队,投早投小,催生一批拥有核心技术爆点的专精特新潜力企业和科技初创企业”的升级之路。

比如,安徽打造了涵盖十大新兴产业的总规模2000亿元“基金丛林”。合肥推出“创投城市计划”,以基金为抓手,聚集资本、挖掘项目、判研项目、匹配项目与资本。

截至今年9月11日,安徽A股上市公司达到173家、位居全国第7位;在皖落地私募基金1800多只,基金总规模超过1.5万亿元,居全国第7位;全省上市公司中,高新技术企业128家、占74%。

一系列手法的改变,让外界看到了安徽在产业发展上的新打法,也更加坚定了安徽加快建设“智能绿色的制造强省”的底气和雄心。

为什么是安徽?

9月20日,一场为安徽先进制造业“代言”的首位活动——2023世界制造业大会,将为“三问安徽”作出最好的诠释。

(作者:姚成二、贾志伟;来源“决策杂志”微信公众号2023年9月)

安徽:深度融入长三角 更高质量一体化

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紧密携手、各展所长、协同发力,发展动能更加强劲,进展成效更加凸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近年来,安徽借上长三角“东风”,搭上“一体化”的快车,实现从“总量居中、人均靠后”向“总量靠前、人均居中”的跨越发展,显著提升了在国家发展战略全局中的位势。

70条具体举措明确“施工图”

近日,安徽印发《关于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围绕区域协调、创新协同、产业协作、设施互联、开放共赢、生态共保、民生共享、机制创新等8个领域提出70条具体举措,助力安徽深度融入长三角。

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郭浩表示,《意见》是推动安徽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总部署,也是“任务书”“施工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实施5年来,安徽牢牢把握“国之大者”,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皖所长,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意见》提出,要构建全省域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新格局。以“融圈进群”为方向,推动合肥都市圈与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等联动发展,提升城市群辐射联动效应。持续推进沪苏浙城市与皖北城市结对合作帮扶、六安与上海对口合作,加快安徽长江城市带、省际毗邻地区、省际产业合作园区、“一地六县”产业合作区建设,全力增强欠发达区域高质量发展动能。

同时,要求以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建设为旗帜性抓手,深化“两心同创”,建设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安徽中心,联合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科大硅谷”、中国科大科技商学院等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推动科创金融良性互动,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共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

深度参与长三角产业分工协作,坚定不移做大做强汽车“首位产业”,加快壮大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加快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布局。打造长三角“大粮仓”“大厨房”,提升区域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培育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建设长三角休闲旅游度假“大花园”。

《意见》明确,共筑长三角高水平基础设施网络。坚持适度超前、协同推进,加快建设联结长三角、辐射全国、通达国际的大通道大枢纽,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世界级机场群和世界级港口群,深化区域能源水利合作,进一步放大安徽区位优势,服务和支撑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为经济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力

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发达,产业链供应链协作紧密,是构建国内大循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支撑,也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产业体系建设成效显著,区域发展潜力稳步提升。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崛起,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呈现集群集聚发展态势。

在深度参与长三角产业分工协作、推动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融合贯通方面,近年来,安徽坚持产业互补、互惠互利原则,主动参与长三角产业分工协作,推动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融合贯通,共保长三角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一级巡视员柯文斌介绍,围绕汽车“首位产业”和光伏储能、新型显示、智能家电等优势领域,安徽联动沪苏浙,加快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力争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推出一批高端产品、形成一批中国标准,实现产业布局更加科学合理、科技创新更加紧密融合、资源利用更趋集约高效。

在今年学习借鉴浙江省以“产业大脑+未来工厂”为引领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经验,提请省政府出台“以数字化引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实施方案和支持政策”基础上,安徽再向沪苏浙学习转化一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方面具体政策举措,并面向沪苏浙引进一批优质服务商资源,更好赋能全省制造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完善长三角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机制,面向沪苏浙开展产业链供需和要素对接‘百场万企’活动,促进长三角地区企业订单扩量添新。”柯文斌告诉记者,安徽将全力办好世界制造业大会,深化十大新兴产业“双招双引”,加大重大项目招引力度,确保大会签约项目中沪苏浙项目数占比超40%。

大力实施“新徽商”培训工程,每年组织200名优秀企业家赴沪苏浙体悟实训,学习先进理念,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发展质效,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以交通同城化助力一体化发展

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离不开交通网络的同城化。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实施五年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在交通同城化、高质量一体化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长江奔涌,东方潮阔。“轨道上的长三角”正动力强劲,支撑一个世界级城市群冉冉升起。

近年来,安徽加快建设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四网融合”的现代轨道

交通体系，共同完善长三角地区高速铁路环状布局，优化普速铁路网络。

安徽省交通运输厅一级巡视员徐敬启介绍，未来五年安徽计划新增高铁 1000 公里以上、总规模稳居全国前列，新增铁路省际接口 7 个、总数达到 21 个，铁路网和高铁网分别覆盖 95%、83% 以上县(市)。

未来，安徽还将构建畅通高效的省际高速公路体系。“聚焦贯通、加密、扩容，提速高速公路建设。”徐敬启说，到今年底，省际高速公路待贯通路段全面贯通；到 2024 年，全面实现高速公路“县城通”，到 2027 年，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7500 公里以上，居长三角第 1 位。

同时，还将新增省际高速接口 3 个、总数达到 22 个以上；合宁、宁洛、宁马、宣广等省际高速公路主通道实现八车道通行；探索打造连接宁波—杭州—上海—南京—合肥的“Z”字型智慧高速公路示范通道。

在航道建设方面，安徽致力于做好“向海而兴、借船出海”开放文章。推动长江干线安徽段深水航道建设，完成淮河干流航道整治，充分发挥江淮运河航运价值，增强主通道通航能力，实现江淮联通、双线出海。

进一步畅通芜申运河、水阳江、新汴河等省际航道，全面融入长三角高等级航道网。巩固完善“一核两翼”集装箱运输体系，推动实施上海港省内主要港口内河集装箱中心项目，让“出海口”通到“家门口”。

让百姓有了更多“同城待遇”

携手共筑增长极，服务新发展格局。长三角一体化的融通共赢，体现在每一个重大项目里，更表现在百姓的生活变化中。

对此，未来安徽计划推进人社系统全领域业务深度融入长三角，以社会保障卡“一卡通”为牵引，努力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贡献人社更大力量。

安徽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二级巡视员陈志刚指出，下一步将深化与省级政务服务平台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制定长三角“一卡通”技术标准和应用场景清单，引导更多群众使用社保卡作为有效身份凭证办理公共服务、政务服务等群众关注度高、使用频率高的服务事项。

同时，深入开展“皖美约惠长三角”惠民服务

活动，培养群众持卡、用卡习惯，进一步拉动内需促进消费，让长三角全域持卡人在交通出行、旅游观光、文化体验等方面实现“同城待遇”。

“着力推进一体协同的长三角地区就业创业服务。”陈志刚说，安徽将继续强化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帮扶，组织实施长三角地区“千企百场校园行”。搭建长三角区域公共创业服务联盟安徽线上平台，推进创业安徽建设发展(上海)基地建设，开展“创新创业千百行动”等多元化创新创业活动。

此外，不断深化一体协同的长三角地区人才培养交流，健全完善一体协同的长三角地区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构建一体协同的长三角地区和谐劳动关系。

“探索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协调联动，推进企业薪酬调查信息共享。”陈志刚告诉记者，创新劳动争议协同处置机制，制定出台劳动争议联合调解和协同仲裁服务规范，安徽将持续探索建立长三角一体化打击欠薪违法行为联动机制，推动实现全省工资类侵权违法案件涉及农民工人数和工资金额连续实现“双下降”。

(作者：徐鹏；来源：央广网 2023 年 8 月)

安徽省推出政企联合打造、市场化运作的工业互联网综合服务平台 “羚羊”带动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

从手工记账到线上管理，一款软件包就可以直接在线记录、同步账务信息。“不仅信息对接效率大幅提升，还降低了企业成本！”安徽金桐精细化学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感慨，没想到，今年与“羚羊”的合作，竟带来意外之喜。

“羚羊”，即羚羊工业互联网平台，是 2021 年 9 月安徽省推出的首个政企联合打造、市场化运作的工业互联网综合服务平台。上线运营近两年，已成为安徽加快建设制造强省、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之一。目前，“羚羊”入驻用户超 35.2 万，累计服务企业 113.2 万次，助力越来越多企业驶上数字经济的“快车道”。

搭建数字平台 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愿转、敢转、会转”

掏出手机、登录“云端”，大枣、核桃、葡萄干等各类产品的成本、货龄、周转期一目了然。“过去是2张表，1张登记原料，1张记录成品，有时台账手动更新不够及时，就会导致订单没法按时交付。”安徽雪域燕果食品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马磊说，现在，从原料库到耗材库，再到成品库，生产流程全能瞧见。

变化源自数字化转型。企业是数字化转型的主体，可对很多中小企业来说，“不想转、不敢转、不会转”的困扰仍然存在。“要是没见着成效，担心钱打了水漂，要是没找着渠道，不知道啥样的产品适合自己。”马磊坦言，一开始，员工习惯手工单，对于软件操作，甚至有些畏难。

若不转型，库存不明可能影响公司经营。“羚羊”的出现，让马磊找到了解决思路——使用数字化软件服务包，搭建库存平台，及时更新台账。

“羚羊”牵线，厂商对接。了解清楚企业难点后，服务商立即为雪域燕果开通了软件账号，并对员工进行培训。“大家上手很快，车间组长全用上了。”马磊介绍，借助程序，生产任务实时跟进，订单延期提前预警，生产发货周期缩短一半，库存积压减少了20%以上，企业效益提升了18%。

羚羊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软件服务包业务组负责人邹云峰说：“通过分解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等工序，我们打造了多场景的企业服务人工智能应用——智能企服助手。还推出产品说明、生产调度等200余款工具，让企业随时随地都能使用。”

工业互联网市场竞争激烈，缘何“羚羊”这个新兵能够脱颖而出？安徽省经信厅工业互联网处处长赵德介绍：“‘羚羊’由政企联合打造，市场化运作，用户、专家、服务商在此汇聚，大量资源和数据进入‘云端’。”2021年以来，安徽省接连出台《支持工业互联网发展若干政策》等文件，设立10亿元资金、100亿元基金，指导、支持行业发展。此外，还在全省开展工业互联网“万人培训、千企诊断”行动，支持以“羚羊”为代表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推广。

“安徽省中小企业超200万户，其中很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少资本缺技术的困境，‘羚羊’为他们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安徽省经信厅总工程师潘峰说，“羚羊”正在开发更多工具，帮

助中小微企业共享数字化成果。“这个平台之所以叫‘羚羊’，正是希望它跑得快、能带头，轻巧灵便。”

打造“工业大脑” 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助力企业开辟新赛道、培育新动能

小组讨论、项目跟进、设计研发……这段时间，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里，陈珍珍忙个不停。作为羚羊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的技术人员，她带领7个组员一年前入驻美亚光电，负责从前期开发美亚数据中台到搭建成本精细化系统的一系列工作。

“结合企业业务，我们搭建了数据中台，整合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等3万多项数据，打造了美亚智联等云平台。”陈珍珍说。

美亚光电靠生产粮食色选机起家，要想突破生产瓶颈，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美亚光电决定先从主业做起，为色选机赋能，让设备上“云”。

合肥美亚智联工业互联网平台运营总监张子旭介绍，美亚智联这朵“云”，已连接6万多个厂商、10万多台在用设备，为传统粮食加工企业提供技术支持。

从过去销售产品，到如今出售服务，美亚光电不仅自身完成了转型，也帮助更多合作伙伴实现了跨越。滁州市的一家农业企业，根据美亚智联平台提供的生产、经营状况数据进行分析决策，订单交付时间由15天压缩至1小时，流转效率显著提升。“仅降低碎米率一项，一天最多能省5000元。”张子旭说。

张子旭认为，与“羚羊”合作，有助于企业跳出本行业，开辟新赛道、培育新动能。

熟悉生产流程的传统工业企业与运用信息技术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碰撞出了创新火花。“‘羚羊’能分层次、分行业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充分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动传统制造向制造服务转变、出售产品向‘产品+服务’转变。”在羚羊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徐甲甲看来，平台携手30多家龙头企业打造“工业大脑”，整合了工业领域的流程、知识与经验，实现设备、产线、用户、材料、技术等生产要素连接。

对接创新需求 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一次线上“发榜”，引来专家“揭榜”。放在过去，科大智能物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副总裁王筱圃想都不敢想。2022年8月，公司遇到技术

瓶颈,钢管表面瑕疵监测精度难以达标。客户不满意,眼看项目交付得延期,王筱圃心急如焚。

既已入驻羚羊工业互联网平台,何不在线“发榜”找寻“良方”?信息发布后,“羚羊”平台技术经理人迅速甄别企业需求,随后,依据专家研究方向一一筛选。“经过筛选、匹配、对接,‘羚羊’发现,安徽大学一位老师的研究项目和我们的技术需求匹配度高。”王筱圃说,双方很快达成合作。

这是“羚羊”促进产学研合作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安徽省不断促进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运用互联网思维,贯通产学研,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要素匹配,既是‘羚羊’的特色,也是目标。”徐甲甲说。

2022年,安徽省印发《关于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依托羚羊工业互联网平台,加快推动先进适用科技成果入驻对接。

“我们鼓励科研人员个人成果上平台,科研院所在此开展产学研对接。”羚羊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产品总监田伟介绍,平台不断助力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

完成对接后,交付形式咋样?产生纠纷咋办?为解决后顾之忧,“羚羊”组织技术团队与高校专家一起,为双方提供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咨询和帮助。

如今,“羚羊”平台上入驻高校及科研院所162所,发布科技成果8.3万余条,汇总技术需求1.2万余条,有700多家企业实现了产学研合作。“下一步,我们会依托人工智能算法和技术经理人,实现供需精准对接,让企业创新少走弯路。”田伟说。

目前,安徽省累计培育各类工业互联网平台137个。据全省工业互联网监测系统统计,安徽省重点平台连接设备数超800万台(套),工业APP超1万个,服务企业9.2万家。企业数字化转型步伐不断加快,创新创业活力持续激发。

(作者:吴焰、游仪;来源:《人民日报》2023年8月)

“从1到100,不能成为一个遥远的距离”

——合肥科技成果转化一线观察

在科技领域,从0到1,代表着研发突破。从1

到100,代表着科技成果转化进入市场。

一座城市的创新能力不仅仅是有多少科研机构 and 成果,更在于有多少成果产生价值、能否在最短周期实现转化。如果技术成果躺在库房睡觉,或在实验室慢慢过期,将没有任何意义。

近日,记者深入合肥科技成果转化一线,探访当地缩短“从0到1”和“从1到100”间距离的实践。

“不会创办企业,我们来辅导;找不到投资方,我们帮忙对接资本”

国庆临近,在合肥高新区中安创谷科技园,合肥夸夫超导科技有限公司将迎来成立两周年。

看到如今公司蒸蒸日上,创始人潘熙锋不会忘记,是高新区“天翅创”众创空间帮他们解决初创期融资需求,搭建产业链、撮合上下游企业,走过了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艰难时期。

“你带着科研成果前来,不知道如何办企业,我们会提供股权架构设计、工商注册辅导;找不到投资方,我们帮忙对接资本。”“天翅创”相关负责人董亮说。

“天翅创”不仅配备创业导师,还提供会计、税务、知识产权等齐全的第三方服务,帮助一个又一个创业团队跨越“死亡之谷关键一公里”“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创办企业最初一公里”。

这只是合肥降低科技成果转化成本的缩影,当地还打造一系列提供基础性服务的共性平台,比如为创业团队提供统一的文献资料、战略咨询、计量测量、知识产权保护等服务。

“我们甚至在招商引资时都会问对方,能给本地科创企业提供什么样的共性服务。”合肥市市长罗云峰说。

据合肥市委常委袁飞介绍,市里在原有招商基础上,组建了由科技部门牵头的科技招商队伍,自今年开始,从过去侧重招引单个企业到突出“1+5”格局,即“制造基地+研发中心、销售中心、上市主体、供应商集群、配套产业基金”。

为成果转化寻找试验场、首用地

科技成果转化的困扰之一是试验场、首用地的缺乏,合肥解决这件麻烦事的办法,是组建城市场景创新促进中心,不断开放全市的企业生产、政府应用等领域的各种场景。

“我们每年新增应用场景上百个,为新技术在城市中开展测试验证、首试首用提供条件。”合肥市发改委主任拱艳说。

记者在合肥一些展馆、医院看到,东超科技的“可交互空中成像”技术被用于非接触式电梯按钮、医疗自助机、自助售票机等场景中,科幻电影中的“隔空触屏”成为了现实。

场景驱动创新引出新产业、新赛道。合肥为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寻找场景,为城市中看不见的隐患“排雷”,催生了城市应急安全产业;量子通信技术被运用于建设提升电子政务安全防护水平的量子城域网,空天科技被运用于数字城管、巢湖治理中……

“我们的量子精密测量有很多市场应用,就是在场景驱动创新中产生的。”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贺羽说,依托合肥开放的民生、产业领域应用场景,公司的量子精密测量技术走出实验室,在疾病早筛、锂电池缺陷检测等领域产生了市场价值。

贺羽说,合肥把城市交给创新,让技术成果与城市发展、产业发展、民生所需相向而行,实现了就地转化、就地交易、就地应用。

不让技术“躺在仓库中睡大觉”

成果转化不是一个天然过程,一项技术有无市场价值、能否变成商品,需要既懂技术,又懂经营、懂法务、懂财务的技术经理人。

安徽创新馆是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已培养近2000名技术经理人。该馆成果转化部专员陈昕认为,这支队伍有助于解决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市场间“找不到、谈不拢、难落地”等问题,破解“高端”不“高值”的尴尬。

“我懂技术,却不懂市场和经营管理,技术经理人帮我们找到投资机构、申请帮扶政策、设计股权结构架构,让成果顺利转化。之前公司还没成立时,就有了多笔意向订单。”安徽大学物质科学与信息技术研究院研究员王绍良说。

原来,单磊教授、王绍良团队自主研发的量子计算用国产极低温稀释制冷机技术,一度面临找不到市场的窘境。在技术经理人帮助下,项目团队已成立公司,开展市场化运营。

合肥组建了5个科技成果转化专班,60多位技术经理人活跃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车间、孵化园区,匹配市场需求,唤醒“沉睡”的技术。今年以来,全市已对接、捕捉可转化的科技成果超2100项,推动新成立企业250多家。

在合肥,越来越多的技术变成生产力。统计显示,2022年,全市技术合同交易总额实现三年翻

一番,全市净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834户,日均诞生5户。

(作者:李亚彪、吴慧珺;来源:新华社2023年9月)

用创新打开发展新天地 ——开局之年看长丰

50秒,组装完毕一台新能源汽车整车;23天,完成百亿元大项目从谈判到签约的全过程;4年,实现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到全国百强县的“身份转换”……

长丰,安徽省会合肥的市辖县。一个昔日籍籍无名的地方,如今正因其跨越式发展而广受关注。

2012年,长丰县脱贫摘帽;2016年,跻身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第九十九位,此后排名连续上升,至2022年已升至第七十三位。“从‘贫困’到‘百强’,长丰的跨越式发展,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结出的硕果。”长丰县委书记李命山说。

“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的殷殷嘱托,长丰广大干部群众用创新打开了发展的新天地。

——理念的创新,开创了县域发展的新格局

长丰县岗集镇的山岭上,“江淮分水岭”界碑矗立其间。处于长江与淮河分水岭的长丰,过去却因土壤贫瘠、干旱少雨,成为少有的省会城市下辖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推进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等县域统筹,把城乡关系摆布好处理好,一体设计、一并推进。”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县域经济的深入思考和科学指引,让长丰找到了前行的路径。

“两新一示范”,合肥市委为长丰县确立新的发展定位——打造合肥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新高地,实现全域协调发展新突破,争当全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示范县。这一新定位,让长丰走上制造强县、科创强县、农业强县的新路。

长丰重新审视发展走向和空间布局。长丰县在北,合肥市居南。“向南主动融入合肥市中心,一体化推进。”长丰果断调整策略,科学规划布局。

思路打开,引领发展突围。长丰因地制宜,依

“市”顺“势”。抓住合肥打造新兴产业聚集地之机，大力发展县城南部的双凤经济开发区；抓住合肥滨湖新区崛起的势头，一体设计长丰县的北城新区，提升城市品质功能。

“方向明确，靶向发力，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这是长丰这些年发展的关键。”合肥市委副书记、政研室主任徐斌说。

——产业的创新，让长丰开启了弯道超车、换道直追的发展新模式

前段时间，长丰草莓正值育苗关键期。水湖镇草莓种植大户蒋秀芝不慌不忙：“我只要打开手机，就可以实时监测草莓长势，掌握温度、湿度、虫害、光照等情况。”

草莓是长丰的第一农业品牌，全县种植面积21万亩，莓农超8万户，年产量约35万吨，亩均年收益近3万元。

“我们的草莓，从选种到育苗到栽培，都用上了现代科技。”长丰县草莓协会会长夏世祥告诉我们。2018年以来，县里每年为草莓产业提供专项资金2000万元，用于新品种、新技术引进推广；2020年，长丰与中科合肥智慧农业谷合作，开发数字草莓大数据平台，实现草莓生产温、光、气、土、肥、药可视化和联动控制……目前，“长丰草莓”全产业链产值已超百亿元。

另一个“百亿元”的故事，则发生在制造业新赛道。

位于县城中部的下塘镇，以“下塘烧饼”出名。2021年，比亚迪汽车选址下塘作为生产基地。从谈判到签约，23天；从签约到开工，42天；10个月投产，生产5个月产值就过百亿元。今年前7个月，长丰生产新能源整车25.3万辆，占安徽新能源车产量的60%以上。

昔日烧饼小镇，今朝产业新城。“比亚迪生产基地一期、二期、三期全部建成后，可实现年产值近2000亿元，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总产值不少于3000亿元。”比亚迪长丰园区总经理李力介绍。

作为合肥的制造业高地之一，长丰规上工业企业359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5家，主板上市公司5家，产值过百亿元企业4家……2022年，长丰县规上工业产值首次突破1000亿元。

“到2024年，长丰规上工业产值预计可达2000亿元。”长丰县县长李孝鸿信心满满。

——科技的创新，让长丰的“发展续航”有了重要支撑

智慧农业谷里，测土机器人、农业传感器等投入使用。“通过数字赋能、科技加持，进一步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中科合肥智慧农业谷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儒敬介绍。

岗集镇，国家大科学装置之一的航太雷电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赵晓东指着规划展板：“这里，将建起大飞机雷电防护实验室。”相距不远，先进光源项目、超级陶浆装置等已经布局，一座“科学城”即将拔地而起。

下塘新城，一座集油、气、充电、换电、加氢供能为一体的综合能源港即将投入运营，包括比亚迪、中创新航等多家规上企业接入的能源工业互联网平台基本搭建完成。“作为全省唯一的能源综合改革创新试点县，长丰正在探索绿色发展之路。”安徽皖丰长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学锁告诉记者，能源港运营后预计每年能减少碳排放6370吨。

开局之年，长丰的科技创新，劲头更足，势头更猛。

长丰县科技局局长张帆，这段时间正忙着研究制定补贴政策，吸引人才。“我们希望释放明确信号：让企业成为创新主体，让人才成为创新支撑。”

今年以来，长丰县已实现4名院士、281名科研类硕博士、25名科技顾问常态化入驻。智慧农业谷、中国菌物谷、产业孵化中试城“两谷一城”，已就地转化农业科技成果117项，带动各类经营主体近400个。

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长丰将继续锐意进取、阔步前行。

（作者：吴焰、徐靖、游仪；来源：《人民日报》2023年9月）

本栏目供稿、责任编辑：黄宁平

启 事

本栏目属转载文章，因客观原因未及与作者提前沟通，请作者看到本启事后，与本刊编辑部联系（电话：0551-62206629），编辑部将按本刊相关制度向作者支付稿酬。

興



國

中石書
德

富 强 民 主 文 明 和 谐 自 由 平 等 公 正 法 治 爱 国 敬 业 诚 信 友 善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西路901号
邮政编码：230031
电 话：(0551) 62206658 62206629
电子邮箱：XB1233@126.com

印 刷：合肥新南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方式：自办发行
定 价：5.00元

